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99期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专辑（3）

【人大专题】

李豫生 人大副校长孙泱之死

——我所搜集到的相关材料

附录一：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的朱德批斗会

附录二：是谁给朱德写的“策反信”？

李豫生 染血的回忆

——人民大学的两派武斗（1967·9—1968·7）

【述往】

刘 炼 新人大公社地牢中的酷刑

唐孝纯 从挨斗到干校

【书摘】

郭影秋 人民大学是怎么被撤销的

冯其庸 为什么解散人民大学

方汉奇 人民大学解散前后

【资料】

还臭老保人大三红总部的本来面目《新人大》56期（1968年1月12日）

是谁打响了第一枪？《人大三红》第61期（1968年5月22日）

反革命武斗狂的罪恶史《人大三红》第71期（1968年8月4日）

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

——再评反动老保人大公社总部“516”反革命《号召书》

《人大三红》第63、64期 1968年6月8日

【人大专稿】

人大副校长孙泱之死

——我所搜集到的相关材料

李豫生

导语

孙泱（1914—1967），原名孙宁世，四川南溪人。其父孙炳文1922年加入



中共，曾与挚友朱德同赴巴黎，在柏林又与周恩来结交，1927年4月在上海遇难，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烈士，而孙泱的妹妹孙维世也是文革中遇害的文化名人，妹夫金山是著名演员，在文革中被长期关押。

孙泱一米八的个头，身材魁伟，才学兼备，曾留学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肄业，1938年加入中共，担任过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科长、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等职。

中共建政后，他历任国家计委军局局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著有《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等。孙泱还担任过朱德的秘书，参与撰写了《朱德传》。

一、孙泱死于江青的诬陷

1967年10月6日，孙泱被发现死于囚禁处——“新人大公社”总部所在的人民大学图书馆楼底层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当时公开宣布为自杀。据说为防止其自杀，室内除床上用品外，空无一物。而他是用卷起来的床单，打成结，一端勒住自己的脖子，另一端拴在暖气管上，坐在地下往前使劲，活活将自己勒死。

孙泱死后，其死亡原因立即引发人民大学校内外的各种揣测，因为公布的自

杀方式疑点重重。不用说他人高体壮，即便普通身材的人，那样自戕的方式也很难成功；他死前并无自杀意向，生存下去的愿望依然存在。此外，囚禁孙泱的一派群众组织，对孙泱之死的具体细节，一直语焉不详，而知情人对此又长期讳莫如深。不过，中央文革致孙泱于死地的企图却分外明显。

孙泱遇难后多年，占主流话语的一直是自杀说，很多人都认为，人民大学校内没有人想置他于死地，尽管他被关押在新人大公社一方，但据说关押他的屋子总是敞开房门，孙泱可以出入，每天还能在盥洗室里与关押在同一座楼里的夫人石琦相见、交谈。孙泱忽然决意自缢，与当天听到江青讲话有关，在讲话中，江青点名孙泱是“蓝衣社大特务”。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可以断定，孙泱之死，与中共最高层人物意图整治朱德有关。在那种年代，被江青等人点名，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彻底完结，孙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决意踏上不归路，以死抗争，于情于理，都可以说通。只可惜，孙家一门两代都为中共而死，而且死状极其惨烈，在二十世纪政治殉葬历史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

二、戚本禹再次指示批斗孙泱

2017年11月间我见到了一位文革时期人大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尊重本人意愿不提及他的名字），他告诉了我孙泱校长死前十数天发生的事情。

他说此前大约一周到十天，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特地叫到大会堂做指示。当时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儿各带了5、6个人，大伙同乘学校的一辆大轿子车去的大会堂。

到了大会堂中央文革接待的地方，有工作人员出来问，哪一派先进去汇报？两派都争着要先说，后来让新入大的先进去了。大概过了近半个小时的样子，赵桂林出来了。三红的人对他说：“老赵，你们等我们一下，等我们汇报完了，一起回学校。”但赵桂林回答：“不用了，我们先走。”然后就急匆匆地走了。等三红几个人进去后，戚本禹先是泛泛地问了人大运动开展的情况，问都重点揪斗了哪些走资派。谈了没一会儿，戚就主动把话题转到了孙泱身上，他明确说孙泱才是人大斗争的重点，孙是大特务，是朱德的秘书，要深挖狠揭，搞出实质性问题来。三红的人于是明白，戚本禹这次叫人大两派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整孙

泱。他们也马上意会到了新人大要抢先回去一步的原因。

等三红一干人等急急赶回学校，果不其然，新人大已经把原来被三红看押起来的孙泱抢到新人大一方看押起来。一周以后，孙泱死亡。

三、戚本禹的目的是“通过孙泱可以搞朱德”



1983年11月2日戚本禹被定性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刑18年。1983年5月20日公诉人赵云阁在阐述他的这项罪行时说：

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些人开会，诬陷朱德委员长“是反毛主席的”，是“大军阀”“大野心家”，指使他们去反朱德和康克清。有人提出：“我们不了解朱德和康克清的情况。”戚本禹说：“曹全夫原是朱德的秘书，你们可以让他揭发。”会后，秘书局的一些人围斗了曹全夫，当晚，又冲进朱德委员长的住所，围斗了康克清，由于朱德未在家，才免遭迫害。第二天，中南海一些人又到全国妇联去“点火”，贴大字报，诬陷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府右街、天安门等处贴出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不仅如此，同月底，戚本禹又亲自到中国人民大学煽动说：“孙泱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孙泱可以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于是，人民大学的一些人，连夜在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阴谋”等大标语、大字报。而后，又发动成立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解放军后勤学院等十几个单位参加的所谓“揪朱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又派人四处搜集所谓“材料”，并且编造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传单、小报，广为散发。仅《新北大报》就印发五十万份，发往全国。

现在，已经彻底查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出现的诬陷朱德委员长的活动，主要是戚本禹秉承江青的旨意煽动起来的。

四、戚本禹晚年回忆：批斗朱德是江青直接布置的

戚本禹晚年回忆见诸于世的有两种：

一是见诸于网络的《戚本禹回忆江青》（2015.7.30 《红色参考》网）；

二是2016年4月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

在这两本书中，关于批斗朱德的 mwpw 略有出入，现将后者摘录于下：

她（江青）和主席的婚姻，本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却也招来很多大姐们的不满。叶子龙跟我说过，在延安时，党内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欢江青，都孤立江青，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缘好，是永新一枝花，再加上都是一起打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叶子龙说，贺子珍和主席吵架，举起板凳就往主席头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不知道会出什么后果。其实江青没有抢贺子珍的丈夫，她是在主席和贺子珍离婚以后，才和主席结婚的，可那些大姐们都认为，（贺子珍说跟）主席离婚，那只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更恶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内的不少人还骂她是婊子（宋庆龄后来也这么骂过）。文革中更有人不断拿这些人的恶语和谩骂做文章，当做证据来抬高别人，贬低和污损江青。（《戚本禹回忆录》第二部分 第三章第3.4节）

在中南海里面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前面第二部分第三章已提到，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她和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反对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尚好，曾志也是贺子珍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这可能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组织了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要求总司令应该坚决支持毛主席，跟刘少奇划清界限之类的，还说他过去反对过毛主席，应该检讨。之后又贴出了“勒令朱德、康克清出来看大字报”的大字报。朱老总倒是真的拄着拐杖出来看大字报。在中南海里碰到他们夫妇的时候，又有人上去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康克清也承认自己错了，承认不尊重江青。

后来我知道，毛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在这件事上面主

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但是这件事我直到今天想起来都很不安。

后来，人民大学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争朱德。起因是人民大学的学生要批斗他们的党委副书记孙泱，而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

孙泱的父亲孙炳文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那时是总理的助手。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孙泱开始不知道，他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和蒋经国是同学，所以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还参加了复兴社。后来党组织和他联系上了，告诉他，他爸爸是烈士，他马上跑到延安去了。人大的学生说孙泱是个特务，就斗他。连孙泱的妹妹孙维世也一起被斗了。孙维世是总理的养女，可不知什么缘故，总理没有很好保护孙维世，后来孙维世被批斗而自杀了。现在人们都传说是江青迫害了孙维世，这是莫须有的事。我没听江青迫害孙维世，倒是我知道叶群要迫害孙维世。叶群恨孙维世，因为孙维世在莫斯科曾经和林彪谈过恋爱，叶群总怕她再来抢夺林彪。所以就抓住她在苏联加入过克格勃的事来整她。其实当时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经常互通情报，人员也可以互相调度。当时加入克格勃是个光荣的事，不可靠的人还加入不了。

我过去对朱德反对主席的事，不很了解。江青向我讲过朱德在井冈山反对主席的往事，所以我就支持了人大学生开斗争大会的决定。总理知道后马上把我找去，他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在转移大方向吗？总理还说，上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就有人斗了朱德。我问总理，中央开会，我常来做记录，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会呢？总理说，那是个绝密会议，你不能参加的。总理还说，总司令在那个会上交代说，他以前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也还有。可到了解放战争就没有了。解放战争时，那些大战役，战场死伤惨重，惊心动魄，都是主席亲自指挥的，他只能做个参谋。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是没有资格来当党的领袖的。到现在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更没有这种想法喽。总理说，后来主席听说刘少奇开会批斗朱德非常反感。主席说，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如果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

总理叫我马上去取消人民大学的群众大会。我马上遵从总理指示，打了电话给人民大学，又叫秘书去人民大学说服他们取消了这个群众大会。（《戚本禹回忆录》第三部分 第十五章）

五、朱德之孙朱和平回忆录相关部分



朱和平，其父朱琦，母赵力平。1952年10月出生，出生后8个月就随着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在中南海里一起生活。1969年被分配到带钢厂当工人，1970年入伍，退役前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空军少将军衔。著有《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长征中的朱德》《我的奶奶康克清》及军事学术专著多部。

《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2004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首次出版，201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下面是此书的摘录：

中南海造反派冲击我家，贴大字报攻击爷爷的情况很快就报告到毛泽东那里。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讲到爷爷时，说：“朱德在国际国内是有威望的，朱德还是要保的。”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并没有制止住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他们继续鼓动“打倒朱德”，并把这股恶风从中南海吹向了社会。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以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就完了，还有呢！”

看到红卫兵有些不解，马上补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怎么个批法？”有人发问。“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

孙泱是孙炳文烈士的儿子。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就在爷爷身边当秘书，建国后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后来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校党委副书记。

正是因为爷爷，这场邪火也烧到了他的身上。

人大红卫兵听了戚本禹这些话，如获至宝。返回学校，立即组织人马写大字报、贴大字块。一夜之间，从城里到城外，到处张贴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

“朱德是黑司令”的大标语。

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名噪全国的“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听说人民大学“批朱”的消息后，唯恐落在后面，但她还不清楚这是不是上面的意思，于是打电话向她的后台康生询问：“人大红卫兵批判朱老总，是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精神？”

老奸巨猾的康生不肯直接回答，拐弯抹角地说：“怎么说呢？形势在发展嘛！问题也越来越清楚了。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自己决定嘛，我给你们说多了不好。”

对于康生的暗示，聂元梓当然心领神会。放下电话，她便急不可待地召集手下人开会，并煽动说：“目前，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清华大学揪出了刘少奇，在社会上打响了，我们‘新北大公社’也要搞一个大的！”

“我们搞谁呢？”有人问。

“朱德！他是混进党内的大野心家、大军阀……”

聂元梓正愁找不到“批朱”的“炮弹”，正好中国作家协会造反派来人找到“新北大公社”，说他们搜出了刘白羽解放前写的《朱德将军传》复写稿，是一株大毒草。于是他们合伙炮制了《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相继刊登在《新北大报》上。随后，他们又将该报加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作家刘白羽写的《朱德将军传》并没有出版。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刘白羽到华北前线，当时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委托他搜集爷爷的资料。通过采访爷爷本人，他写成了一个传记的初稿。后因爷爷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刘白羽的写作也就没进行下去，便把已写好的初稿复写了两份交给了组织。其中的一份复写件曾送到美国，给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做参考，史沫特莱在病逝前又托人把它捎回还给了刘白羽。就是这份复写的初稿，被造反派用来大做文章。他们将书稿印刷成书，组织人员撰写批判文章，而承担此任的人怎么也找不出书中有什么政治问题，反而从中了解了爷爷的革命经历，并对爷爷的遭遇暗自同情。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在校内揪斗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孙泱，企图从他那里打开“倒朱”的缺口，

但他们却终无所获。

这个跟随爷爷多年、忠实于革命的烈士后代，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著名表演艺术家孙维世也由于江青的迫害而含恨九泉……

“人大三红”还串联北京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共同成立了“首都揪朱联络站”，筹划召开万人大会，在社会上公开批判爷爷，并且还要拉上我父亲陪斗。同时，又分几路人马杀向各地搜集爷爷的“罪行”。

就在周恩来总理没有出面干预“批朱大会”的那段时间，“人大三红揪朱兵团”来到天津，闯进我母亲所在的医院，在医院里贴满了“打倒黑司令朱德、儿媳妇赵力平”的大字报。他们煽动群众，大肆诬蔑“朱德是黑司令，不会打仗，没打过仗，是个大军阀。”

一计不成，一计又生。“人大三红”密谋绑架了我母亲。



当时我母亲住在她们医院的宿舍里（赵力平自1957年始担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本刊编者注）。那天夜里12点多，有人对看门的老师傅说，要找赵院长，要抢救病人，必须要她去，否则病人死了她要负全责。这个老师傅赶忙找到我母亲说：“赵院长，你可别出（朱和平的母亲：晚年赵力平）来，我看这些人不善，不像是好人，你千万别出来！”

我母亲想：不去不行啊，真有病人不去抢救，这不是又给造反派一个口实吗？再说病人出了事怎么办？

那时候我妹妹还小，我姥爷、姥姥跟我母亲住在一块照看她。我母亲也没敢惊动他们，就急急忙忙出来，还没到门口，一帮人就“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把她拽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带发动机的三轮板车里……我母亲质问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力抓人，你们简直成了土匪了！”

他们也不吭声，开车就走。

机动三轮车在寒夜里颠簸，连个篷子都没有，寒风刺骨。我母亲被四个人夹在中间，不知被拉到哪里去。她直挺挺地坐着，一夜没有合眼。

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我母亲被拉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带进一个昏暗的小屋。待了一会儿，有人偷偷地对她说：“他们绑架你来是要开批斗会，是敦促你交代朱德的问题。”

后来知道，当时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其实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我母亲揭发爷爷，不揭发就开她的批斗会；另一派则不同意，说人家是天津人，“人大”没有权力开人家批斗会。

……

就在我母亲被带走的第二天，传达室的那位老师傅告诉我妹妹：“昨天晚上你妈妈被一伙人给带走了。那一帮看起来不是好人。”听了这个消息，我妹妹赶忙跑到我父亲的单位（朱琦的工作单位是天津铁路分局机务段——本刊编者）。



到了那里才知道，我父亲也“失踪”了……

最后还是通过北京铁路局找到北京造反派的头头，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都被他们绑架到了北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天津铁路局找他们谈判，说：“你们是北京造反派到外地去抓人批斗，这不合原则吧。”

又加上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人大三红”这才（朱和平的父亲朱琦：1916-1974）把我的父母放了回来。

六、《朱德传》相关部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年12月出版的《朱德传》后记记载：此书依据的主要资料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朱德5000余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他所参加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从工农红军到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会议记录，他的大量工作笔记；还有朱德在1937年口述，由他的秘书孙泐等记录的8万字左右的《朱德自传》稿本。江青、戚本禹等人死抓住孙泐不放，应该是想以此为突破口整倒朱德。

七、张春桥在上海煽动批朱德

1967年2月24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

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讲话：

大家也来看一看吧，现在事情都已经揭开了，大字报都上街了，其实这些事呀，很多事情党中央过去没有公开就是了，那么你比如像这个朱德总司令，这个是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嘛，我们现在学习的《古田会议决议》，那里面好多条就是讲朱德的，那里面就是纠正错误倾向，谁代表错误倾向呢？就是朱德代表！但是毛主席对这种人是拉着走，总希望能够多团结一些人嘛。

八、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诬蔑孙泱、孙维世

1967年7月，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文革后，孙泱遗孀改嫁，留下一女二子：孙盘、孙宁、孙名，不知今日如何？

■

【附录一】

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的朱德批斗会

一、语焉不详的回忆

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烁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

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鄙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¹ 林彪有关“政变”的讲话发表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对之大为不满的“中央的会议”显然是指这一次了。但为什么持如此的“鄙视态度”和造成如此“不屑一提”的恶劣“心境”，康克清的回忆却戛然而止。

终于，在最近出版的，由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似乎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厉的批判。该书有如下的记载：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泽东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²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但有关批判会的详情，此处又一次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

其实有关林彪批判朱德的讲话，在文革中由红卫兵出版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林彪同志讲话选辑》等等的小册子中曾广为流传。但康生的讲话，以及这个“小组会”却是第一次提到。非但在文革中朱德被批成“黑司令”时都从未所闻，在文革后批判康生以及“四人帮”的高潮中也未见提及。奇怪的是：既然恶毒攻击朱德元帅的是林彪、康生之流，在粉碎“四人帮”后应当公开地愤怒声讨才是，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有难言的苦衷。

众所周知，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上，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两天后，林彪在会上又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后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虽然在文件中说“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

¹ 康克清：《最后的十年》，载《解放军报》1986年11月29日。

² 许农合主编，《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共上层，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厉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为什么中共至今对此地羞羞答答、遮遮盖盖？

二、朱德批斗会记录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记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厉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做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做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做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没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

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三、值得深思的问题

只要对这个记录稿匆匆一瞥，明眼人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至今讳莫如深的态度了。人们不难理解林彪对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凶狠。因为朱德曾是红军的司令，林彪只有通过打倒他来建立自己在军内的最高威信。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另外，积极参与批判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也无一不是后来的文革受难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关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帮”毫无瓜葛。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怎么还能把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有谁，他们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如果说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共要员们对毛泽东要搞的人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些深谙权术的中共要员们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³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刘少奇。陈伯达在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⁴

由此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最后还会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做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鄙弃。

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

³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内情》，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⁴ 罗冰：《官方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载香港《争鸣》，1999年3月号，21页。并参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和《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为壑、落井下石，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如果说林彪的“政变经”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那么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对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革绞肉机的轰然起动。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一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一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

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冈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劣。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作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⁵周对朱德的痛

⁵ 周恩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一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一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一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刘要这样做，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与刘邓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蒙族）成员乌兰夫的表演和下场具有更快更惨的悲喜剧性。在批斗朱德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刚开始的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会议自5月22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历时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委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1. 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2. 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3. 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4. 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的罪行要远远超过他批判的朱德。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

世隔绝的软禁生活。⁶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齿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无原则地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和腾达中共领导人们在文革中很少善终。

刘少奇和邓小平刚把彭、罗、陆、杨和乌兰夫打成“反党集团”，自己一瞬间就变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后台。刘连被火葬时都只能用“刘卫黄”的假名。

陈毅在所谓的反“二月逆流”中被张春桥等人反复用他想推给朱德的“历史问题”狠整，在中共九大的小组批斗会上被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翻开历史老账，批得“呼哧呼哧吐着气”“颤巍巍”、灰溜溜。⁷最后在比朱德更为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患癌症逝世。

周恩来机关算尽，最终也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贵——“四人帮”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围剿中患癌症辞世。因为怕给人死后鞭尸掘墓，死后连骨灰都不敢留。

林彪在发动文革上充当了毛的第一号打手，也曾位极人臣，当上了“接班人”，但最后还是被毛猜忌，被迫为保命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的下场……

至于薄一波，也只是有权批判别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实真相却是，1936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狱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后公然出尔反尔，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把他们打成了“叛徒集团”。⁸

如果说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了什么，那么最能说明的一是历史真相，二是历史教训。这个不幸而痛苦的历史真相是：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⁶ 启之：《内蒙古文革实录》第二章，香港，天地图书，2001。

⁷ 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47—48页。

⁸ 见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调查报告》的通知。

说到历史教训，从这一历史真相的记录中人们所看到的文革的发动完全是一种中共所有领导人的集体犯罪，一种积极推动革命绞肉机发动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绞肉机中的消极牺牲品的集体合力，即那个党的集体犯罪。这种集体犯罪并不一定时时是有意识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为这种丑陋之风盛行集体无意识状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首先是“害人者”和“受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别性和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刘少奇的党史专家张化在分析刘为什么在文革发动期主持那些最后导致打倒自己的会议时指出：“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的思想状况来看，这场‘革命’与他思想中的某些认识存在着相通之处，这构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张化进一步指出了诸如“拥护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夸大阶级斗争”和“开展夺权斗争来解决基层问题”等三条。⁹当然要补充的是：刘少奇所倡导的所有文革式的“阶级斗争”是只准备残酷地斗争别人的。历史的逻辑向他设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发动的文革却最后残酷地斗死了他自己。其次，因为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一致性，才说明了这个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无可救药。

在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动文革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这已经不是自保，而是自戕了。¹⁰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不取消一党专制的体制，文革式的悲剧在中国是一定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现的。❏

【附录二】

是谁给朱德写的“策反信”？

原浙江省公安厅侦察干部杨宪澄在《砸烂公检法和清理阶级队伍》（《炎黄春秋》2013年02期）中谈到朱德在文革中收到一封匿名信的事，摘录如下：

1966年8月，文革正在拉开序幕，在林彪“政变经”发表三个月后，紧接

⁹ 张化：《刘少奇的悲剧于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页。

¹⁰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内情》，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着就发生了策动朱德老帅起来发动政变的匿名信案件。具体案件情况如下：

据当时公安部一局派专人来浙江省公安厅介绍称：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老师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主席。公安部谢富治部长将其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案件的侦查工作。

浙江省公安厅由副厅长丛鹭丹负责，抽调刘德芳、谢士栩和我一共六七人成立专案组着手侦破。此案因发信邮戳为8月8日，故称为“八八大案”。

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为作案者大胆妄为：语词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1956年毛主席在杭州，厅领导要我将海外重要情报照上述要求抄报毛主席)，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同时到达时间十分接近，对朱德行踪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绽。

在此期间我们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内部高级宾馆)、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我们曾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当公安部得知我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我们工作情况，对这么一起大案从此偃旗息鼓实属反常。

同年12月，我在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此案的看法(我与丛关系较好，1957年反右时他私下要我多听少讲，当时算是保护部分骨干的措施)。我大胆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我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在我这里说算了，千万别在外面乱说。”僵持几秒钟后他关上门，轻轻地对我说：“我也有想法，回去什么也别提……”我点头说：“我懂。”

1967年2月传出所谓“贺龙兵变”之类传闻，张张扬扬一阵后又偃旗息鼓，

无非配合林彪的“政变经”的正确预见性。不久，戚本禹提出“打倒黑司令朱德”口号的大字报，北京红卫兵举城响应，毛主席出面阻止说：“这样提不妥，朱毛朱毛，国民党的时代他们要杀朱拔毛，他是司令，我是政委，他成黑司令，我算什么？朱德是红司令。”一时间所有攻击朱德的大字报销声匿迹。这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亲自出面保护一位领导层干部的讲话。事后从传闻中知道毛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认为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而表示不满。文革开始时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林彪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同时批判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与会的纷纷跟从批判朱德老师，甚至有的说“毛主席说你是党内中常委中的定时炸弹”。然而不到一年，毛主席来个大转变，亲自表态：“朱德是红司令！”应该说是那支测量朱德忠诚的体温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老帅能躲过一场灾难。

不久，在砸烂公检法中，王芳、吕剑光、丛鹭丹三位厅领导被押往北京审查，我则在机关被隔离审查，我一直为自己讲过“此案是一支体温表”而忐忑不安，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是属于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大罪，是必死无疑的。直到后来我与丛鹭丹先后被解除审查，见面时会心一笑，才卸下了一个沉重包袱。

此文倘能得到有关人士的补充或纠正，我将十分感激。因为历史不能被歪曲和掩盖。☐

【人大专题】

染血的回忆

——人民大学的武斗（1967·9—1968·7）

李豫生

人大武斗溯源

1968年5月22日一场空前惨烈的武斗在人大校区西部游泳池东侧空地发生，“人大三红”及“新人大公社”双方前后各有七八十至百五十人参加（见1968

年5月29日人大三红报第62期第四版文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五·二二反革命武斗事件纪实”。其间骨干武斗队员手持锋利长矛近身相互捅刺，致使双方各有三四十人严重受伤。而因新人大一方的参与者中有部分同学是被突然招呼上阵的文艺宣传队员，这些同学没有防护且未经训练，仅拿着简易的棍棒……（见人大818微群2017年7月11日文革武斗相关讨论），因此当场有3名同学：廖金妹、杨大志、陈荣祖被刺身亡，还有一名被刺中头颅的沈士根同学在瘫痪失智年余后死亡。

事件中最令人锥心痛惜的是农经系一年级女同学廖金妹的死：她就属于被仓促招呼上阵的文艺宣传队员，既无武器也无铠甲，虽身在现场但绝不可能参与对刺。她是在救护同学后撤的状况下被刺，致命的一枪从她的右后背斜刺而入，直穿心脏，即刻毙命。刺人者心地之残忍、下手之狠毒绝无疑义！两个月后制止武斗的军宣队进校时也曾重点追查此事，但因时值“打倒杨、余、傅”之际，而死的人又都在新人大一方，所以追查的重点是背后有没有杨、余、傅黑手（见2017.11.21对李德山的采访），最终并无结果。但人们相信，刺人者当时并非混乱或失手：因为他曾下大力从背后追着猛刺了一个对方救护伤员的女同学一枪，完全不是在蒙面对刺的情况下，况且他还需将长矛的矛尖拔回，这也是要费大气力的！也许只有杀人者自己清楚，但为求自保他选择永远不说！

曾经同校共读的学友就这样死在了同学的长矛之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当时大学校园里的两派所谓“革命群众组织”走上了兵戎相向、你死我活的武斗战场呢？应该有所追究、有所反思。

著名文革研究学者印红标教授在“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一文中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为人们深恶痛绝的，莫过于武斗。即使在狂热的动乱年代，武斗也是为中央文件三令五申禁止的、为民众所谴责的行为，分析武斗现象的特点，武斗参与者的心态，对深入认识和探究武斗的原因，反省文革悲剧，具有重要的意义。……武斗参与者行为特征和心态的差别，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色恐怖”型“派性斗争”型和“刑讯逼供”型武斗。

人民大学以贯穿东西的“共青团路”为界、划区割据的“派性斗争型”武斗，

始自1967年9月1日，这一天发生的“抓肖前事件”，正是由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会合”——“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而引发。

拿下王力、关锋的决定是1967年8月30日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宣布的（戚本禹延后至68年1月），人大三红第一时间得知消息，立即行动，于9月1日晚在肖前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家里把他抓走并迅速转移到体育学院。新人大得知消息后，以为肖前被关在东风三楼的法律系学生宿舍，所以出动了近500人（据1967年11月23日人大三红报称）把东风三楼团团围住，双方发生冲突，这就是此后互抓互占、两派逐步分居校园一侧武装对峙的开端。

三红为何抓肖前？因为肖前与关锋有很深的私交，文革前肖前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发迹本身就得得益于关锋的提点，他在人大文革中的一系列行动又都征询过关锋的意见。如此紧密的关系，在关锋贵为伟大领袖近侍、要员之时，当然是所领革命群众组织的定心丸；旋而关锋一倒，“香饽饽变成了烫山芋”，肖前便陡然成为三红炸垮对立派新人大的一枚重磅炸弹。

李德山是三红派去抓肖前的负责人，他回忆说：

肖前在文革前和关锋是好朋友，都是哲学界的，而且肖前是紧跟关锋的，肖前第一位夫人去世的时候，还是关锋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夫人）。肖前之前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走出来》，那篇文章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那个内幕都是关锋透露给肖前的。那句话原本是毛主席讲过的，所以这篇文章正好迎合了主席的这个想法，肖前一下子火了。这是63年以前的事情了。”“因此肖前跟关锋的关系很好，所以关锋他们要被江青他们抛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散布（透露）消息，肖前是跑不了的。

肖前是被戚本禹解放出来的，戚本禹到人大讲话，一个是解放他，另外一个就是解放胡华。所以新人大就把肖前弄过去，当了副社长。人大三红（这次）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要整垮对方组织，他们就想抓住肖前，肖前还不知道呢！那天总部来找我，让我接受一个重要任务，去肖前家里抓他。

问：“你们是从内部知道了这件事吗？”

李德山：“对，刚刚知道，这事还没有公开。突然得到通知那天晚上就要去抓他。”

问：“谁通知你去的，孔宪龙？”

李德山：“嗯。我也是才知道要把他给弄来，弄到了总部去。但是新人大知道把他们的副社长给抓走了，就开始了围楼，围攻我们的办公楼。新人大在武斗的时候是很厉害的，所以要想办法把肖前给运走。当时就从总部后面悄悄运到了法律系的东风三楼里待了一段时间。到了晚上，新人大的人越来越多，待在这里也很危险。当时他（我）们就想办法和北京体育大学联系上了，应该是北体有一派和三红也有联系。就从学校外面找了一辆卡车，开到了墙外面等着，我们怕新人大的人看见，就把肖前用床单还是什么的给裹了起来。

问：“手脚绑起来了吗？”

李德山：“手是我捆的，怕他给跑了。然后几个人很快抬着运了出来，当时我就跟了出来上了墙头，外面还有一个人接应，然后把他放在卡车上了，运到了北京体育学院，放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

肖前能够成为新人大副社长，有其必然性。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并非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以伟大领袖一人为头脑、亿万人民群众为直接手足，一举摧毁各级原有社会管理机构的天翻地覆，这就是伟大领袖一手导演的“天下大乱”。其间，只有直接受命于伟大领袖的极少数几个人组成的工作班子——“中央文革”，才有可能了解最高领袖的旨意并负责向亿万群众传布。亿万群众以及失去了权力的各级干部必须竭尽最大努力探寻、了解最高领袖的心思，并将是否与其心思相符作为“革命”与“反动”的界限。各部分群众因对“上意”的揣摩不同，必然分成对立的派别。对立的派别又都想通过各自的人脉、人际渠道抢占先机，争取先对方一步站到与最高领袖最贴近的位置。

由是，新人大有了肖前——王、关、戚的“铁哥们儿”这个副社长；“人大三红”有了聂真——伟大领袖敲响大革命开场锣的重锤、标杆聂元梓的亲大哥这个“铁后台”。

王关戚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炙手可热的人物，是伟大领袖的爱将、干将、马前卒，文革的发动、推动、实施、运行直接得益于他们的冲锋陷阵。他们是当时的舆论旗帜——“两报一刊”之一刊“红旗”杂志的主编、主笔，在亿万人民的心

中直接代表伟大领袖的声音。甚至可以说，他们笔下的篇篇社论就是文革中的一次次冲锋号、动员令。能够得到他们几个人的耳提面命，无异于站到了最靠近伟大领袖的行列。

1967年3月，肖前刚刚亮相新人大不久，就在《新人大》报第三期发表了署名文章——《剥开“三反分子”孙泱的画皮》，文章中，肖前有三处地方提到关锋。一是说在前中宣部召开的学习和讨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会议上，关锋如何当面批判许立群并加以质问。显然，这些话非关锋亲口告知，肖不可能知道。二是在批判“三家村”时，语文系一些人编了有关《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材料，被孙泱加上了旧市委的按语定调，后又隐匿罪证。肖前到前党委讨要这份资料，准备直接送交关锋，但遭到拒绝。三是批邓拓时，《红旗》杂志林杰、阎长贵找肖前转达关锋意见，要组织揭发邓拓与林希翎关系的文章，肖前去找孙泱要资料，孙泱推托。后在肖前的逼迫下，孙又称已将法律系写的资料送上去了。事后肖前向关锋核对，关锋告诉他材料没送给过关，而是送到其他黑帮分子手里了。

这篇文章的用意实在是明显得不能再明显，肖前俨然是“钦差”的“钦差”，彼时的新人大真可谓“背靠大树好乘凉”！

但是，按照当时“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肖前一旦站到新人大一边，三红就必然激烈反对。对此，新人大战士坚定表示：“肖前同志我们是‘保’定了。”在1967年7月26日第二十八期《新人大》报第四版上发表了署名“慨而慷战斗队”的文章“彻底解放肖前同志”。文中写道：“肖前同志最早从黑党委冲杀出来，大造狗特务、三反分子、我校头号敌人孙泱的反；肖前同志十几年来在理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基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适、杨献珍、孙定国之流进行了斗争；肖前同志一解放，立即喊出了‘打倒三反分子崔耀先’的口号，尽管肖前同志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写过不好的文章，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的：‘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正因为如此，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多次解放他，说：‘肖前同志不是黑帮，不是右派’，‘肖前应该归到多数里面’，‘你们应该解放他了’等等。”

这都表明了肖前在新人大不可替代的地位、作用。

反观三红，在新人大对人大三红的激烈抨击中我们又看到了聂真曾经是人大三红想结合的领导干部，人大三红是想把他从外校请回人大来三结合的。

据《新人大报》揭发1967年7、8月间由朱真几面牵线，召开了一个有聂真、崔耀先参加的“青岛黑会”。朱真是聂真的秘书，是人大三红主要结合的中层干部，积极参与人大三红的各项工作：在1967年7月22日的“人大三红”报上明确报道了朱真在三红干部革命大批判大会上发言的情况。这篇题为“在大批判中 建新功立新劳”的报道写道：“在毛主席干部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校大批革命干部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抑，纷纷杀了出来。他们坚决响应中央文革和市革委的号召，拿起笔，作刀枪，以各种形式积极投入了当前的大批判运动。七月十五日，他们召开了广播誓师大会，吹响了大批判的进军号。孙锁存、朱真、宋德敏、樊亢等革命领导干部在会上发了言。七月十七日晚，他们又自己主持召开了《彻底埋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这是一个充分显示了毛主席干部路线无穷威力的大会。”

郭影秋在文革回忆录里对朱真对他的积极批判印象深刻：“但也有个别人，心地不那么善良，甚至赤膊上阵，对我进行诬蔑栽赃陷害。譬如党委宣传部的××，在一次批斗会上，说：‘我可抓住了你的黑手啦！’”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层干部中绝大部分只是校领导的陪斗，鲜有如此积极地冲在批斗老领导的。朱真文革后没有再回人大，而是跟着聂真去了社会主义教育学院，足以说明他和聂真渊源之深。

既然找“红人”、跟“红线”是文化大革命的常态，为什么革命群众组织又会不断出现跟错人，站错队的现象？即所谓“犯不完的错误，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

这是因为随着事态的变幻，最高领袖的即时目标、意图会不断发生变化；最高领袖对所使用的极少数人的好恶及信赖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正所谓“今日堂上客 明朝阶下囚”。

1968年3月27日，在中央文革于东郊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文革干将陈伯达总结出了到当时为止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五回合——第一回合：打倒彭、罗、陆、杨；第二回合：打倒刘、邓、陶；第三回合：击溃二月逆流；第四回合击退刘、

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第五回合：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在前三个回合中还是革命干将、先锋的王、关、戚，在前四个回合中还是领袖近侍、信使的杨、余、傅，在后面的几个回合中尽皆翻身落马逆转成打倒对象。权力中心在文化大革命中走马灯式的连番洗牌，使得始终想紧跟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的各派革命群众组织手忙脚乱、无所适从，大家都要防止在急速的弯道转车时被革命的列车抛下，更何况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弯道转车。斯大林的名言：“每当历史的车子在转弯时，总会有人从车子上掉下来。”一时流行，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在瞠目结舌之时，必须与曾经的“偶像”急速切割、断臂求生。

肖前被抓，新人大怎么办？

新人大中立即有人“弃暗投明”“再次造反”。九月十二日“新人大斗肖联络站”成立，他们中的知情人这样“揭发”——赵桂林当即纠结：“（在肖前问题上）承认错误，那我们的一切不就都错了吗？”（见由反出新人大“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12月16日另行出版的《新人大报》红一号第2版文章——《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足见当时新人大一派的震惊、惶恐。

9月2日一早，新人大公社社长赵桂林就赶到社科院民族所找王恩宇、洪涛商量对策。

洪涛、王恩宇（社科院民族所？待查）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当时掌权的“红卫兵联队”一派的领导层成员，“红卫兵联队”的头头是吴传启、林聿时。

“吴传启、林聿时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由于他们在文革前与关锋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开始时他们能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那里得到最核心的机密，比一般人更能窥透当前的政治动向。……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有关锋甚至陈伯达、康生的幕后指导。……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潘梓年的座牌位，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网摘 孟祥才回忆录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原标题为“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肖前非但与关锋关系密切，还传说是吴传启西南联大的同学，层层关系、渊源使肖前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派系的“死党”、追随者，凡事向他们请示、与他们商量。这一派系的重要成员还包括《红旗》杂志的林杰。林杰是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毕业的调干生，1961年《红旗》编辑部建立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关锋为组长，林杰、阎长贵等四人师从关锋，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王、关、戚”事件中“肇事”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此文的内容是“抓军内一小撮”——本文作者）即为林杰起草。

此前，在肖前的引荐下，新人大社长赵桂林与上述各位“名人”都曾有过密切接触。

王、关倒台以后，学部与之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学部的另一派组织根据戚本禹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隔离审查。

王、关倒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旋即又演化成一波更大狂澜，与之联系的各派群众组织被认定为“五一六”组织，他们的头头都被定性为坏头头。

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接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首都部分红卫兵组织，发出：“对五一六组织的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的指示，并提了一个名单，将林杰、赵易亚、《光明日报》总编穆欣定为反党小集团，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等几十人都列入反党集团内，让革命派抓捕他们。

1967年12月12日《人大三红》第57期第三版公布的9月2日赵桂林到社科院民族所找王恩宇、洪涛求援的内幕，就是在王恩宇被抓之后，9月26日人大三红去“提审”王恩宇时的“审讯记录”，内容如下：

反党阴谋集团黑干将王恩宇的交代：

9月2日上午九时左右，赵桂林穿的蓝色中山装到民族所三楼中间南面的房间里，我从里面睡觉出来，他说，你也在这里？他坐在沙发上，有洪涛在，还有民族研究所的几个同志。赵坐后讲：他们（指人大三红——编者）把肖前抓走了，打了一顿，打完后捆在门板上，打得半死，扔在外面，我们到地下水道找，也没找到。他们对我们攻得很紧，可能要砸我们，搞武斗，我们也得准备，我们把水池的铁棍子都拿来了，武装自己。洪涛说：是啊，也要像民院这样，搞武斗。赵

说：我们也得把人员集中一下，占几个楼，准备一下，把我们的人组织一下。洪涛说：那你们自己办吧。赵又问：林杰的问题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清楚，我们学部是不行了。我自己是挂在黑线上，我在考虑自己的问题。

赵又说：是不是大家串连一下，谈谈形势。

洪涛说：那你们自己串连吧！

我说：反正我们学部不行了，我们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管了。

二十分钟左右，赵就走了。他是怎么来的不清楚。

9月5日上午九时左右，洪涛说昨晚江青同志表态了，有的说江青同志说吴传启是陶铸式的人，有的说吴传启是陶铸的人，我说把问题弄清楚。他说昨晚开会人去的很少，人大两派都去了，我给赵桂林打电话问问，他就到另一个屋打电话去，不一会他回来说，赵桂林说是表态了，江青同志说穆欣是特务，吴传启是陶铸的人，肖前是特务，林杰是《红旗》一个小编辑，他的问题中央会解决。你们不要插手。

情况就是这样。

王恩宇（签字）9.26

王的交代显示：肖前所依仗的关锋一派已经土崩瓦解，吴传启、潘梓年逃之夭夭，洪涛、王恩宇自身难保，赵桂林所言“我们也得把人员集中一下，准备一下，把我们的人组织一下。”实乃困兽犹斗而已。

9月11日新人大公社召开《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大会》，借“热烈欢呼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之机，找到说辞，把肖前说成是与陶铸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式的人物，借以与肖前斩断切割，脱身自保。会上，公社负责人张祖义代表总部指出“混进我们队伍中的肖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在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反革命两面派肖前的揪出，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显示出我新人大公社无比坚强和巩固。以前由于我们警惕性不高，没有及时地识破肖前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今后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教导……”云云。

9月12日新人大公社召开斗争肖前大会，报道称：“九月十二日下午，新人大公社全体战士坚决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事，满怀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

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无比热爱；满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在公社委员会的组织下，召开了斗争三反分子、反革命两面派肖前大会，无情地揭露了三反分子肖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个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也打击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利用肖前问题打击我新人大的罪恶阴谋。”（见1967年9月14日《新人大》报第四十期第二版）

新人大于肖前，从9月1日的“拼死相救”，到十余天后的高帽子、喷气式伺候，唯紧跟而已。虽学着上峰“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节奏，但置身于对立派的虎视眈眈之下，想洗脱又谈何容易？就在该消息发布的同一天，《人大三红》第四十四期第四版通版刊载长篇揭发文章——“肖前与反党阴谋集团的若干罪行”，历数肖前与“新出笼的”反党集团的种种千丝万缕，细至每个事件、每次行程，甚至每通电话。呜呼哀哉！其文必为“叛”者所为。若不是身边近人、核心参与，哪能提供如此细密。

面临靠山倒塌的灭顶之灾谁不得不绝地反击、重觅生路，没有哪个会束手待毙、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守为攻，寻找缝隙，将被操纵的帽子抢先套到对方头上。人大两派的武斗如同北京乃至全国各地两派激斗的情况一样，就是在这种内在逻辑的驱使下催生发展、逐步升级的。

人大武斗的第一阶段

人民大学的“派性斗争型”武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抓人比赛到形成割据。时间自1967年9月1日三红抓肖前始，至11月底北京卫戍区派出的军宣队主持下双方签订制止武斗协议止。

文革中各单位两派组织的对立，由观点差异，到组织对抗，到你死我活，争的是什么？与其说是争权力，毋宁说是抢光环、避落水。光环就是争当紧跟伟大领袖的“革命造反派”，落水就是沦为死不觉悟的“反动臭老保”。

为证明自己“响当当”、对方“臭狗屎”，双方开展抓人比赛，被抓的重点有三类人：

第一类：抓与失势高层有牵累的人；第二类：抓对方队伍中的所谓坏人；第三、抓对方骨干分子。

第一类：抓与失势高层有牵累的人：

“三红抓肖前”，即如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勉强同肖前割裂的新人大，根据当时尚未抛出的戚本禹的指示，抢先把原在三红手中看押的孙泱弄到自己一边审讯，意在抢功。未曾意料的是，10月6日孙泱竟在新人大总部离奇死亡，于是新人大弄巧成拙、雪上加霜。

在一系列问题上频频被动之时，新人大也找到了几次翻盘的机会：其一，三红有反康生、反总理的“前科”。×月×日三红共同课鲁从明、寇金和等贴出过打倒康生的大字报，×月×日三红姚中原炮打周总理，这些都是可以重新翻出来戴上5.16分子帽子的。其二，1967年10月20日三红欲结合的校级干部聂真突然被公安部门逮捕拘押，新人大认为是本派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胜利，遂即抓住了聂真在三红的代言人朱真，以求确证。其三，11月初新人大发现了三红的一个主要成员王昆顺的5.16嫌疑问题。新人大遂于11月11日诱捕王昆顺，给予三红猛力地还击。

关于抓王昆顺一事，1967年11月29日《新人大》报第五十期 第四版“人大地下黑党委操纵人大三红总部挑起大规模武斗罪责难逃”一文有详细记录：

十月廿六日军委办事组关于“五一六”问题的指示下达后，我新人大战士立即行动起来，大家表示，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揪出他们的黑后台，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经过周密调查，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继五月十六日揪出炮打周总理、谢副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五一六”重要成员姚中原之后，于十一月十一日，又揪出了三红总部长长期包庇的“五一六”分子王昆顺、王英明，并抓住了“五一六”分子王昆顺。

“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王昆顺（原人大三红政治部主任，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之一，是我校新闻系五年级学生，现人大三红新闻兵团负责人）。今年二月至六月调红旗杂志社工作。在他担任记者期间，来往于王力、关锋、林杰与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张广武、吴昂等人之间。今年五月上旬，曾以红

旗杂志记者身份参加二外“五一六”分子串连会，以种种方式煽动和支持“五一六”分子大反周总理。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散布“周总理是张国焘的红人”，“周总理反对毛主席”等无耻谰言。胡说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折中、调和，搞机会主义。并多次以所谓揪陶铸的例子，煽动炮打周总理。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王昆顺、王英明是今年五月份二外炮打周总理的策划者和煽动者，是不折不扣的“五一六”分子。

二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张广武、吴昂等人被揪出后，曾交代并揭发了王昆顺、王英明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二外红卫兵早在两个月前就整理了王昆顺、王英明等人的材料，并通知了人大大三红总部，希望三红总部自己揪出王昆顺等人。但时至今日，三红总部在以聂真、崔耀先、朱真、铁华为核心的反革命地下墨党委操纵下，竟置若罔闻，说他们调查结果王昆顺等人不是“五一六”分子，竭力替王昆顺等人辩护，进行包庇。

为了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一月十一日，我新人大公社卫东兵团，采取了断然的革命行动，揪出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王昆顺，对他进行质问。”

11月11日因新人大抓王昆顺在新闻系所在南一楼引发的两派间一场恶斗，是人大两派武斗第一阶段的高潮事件，两派报纸都有详细记录。

《人大三红》1967年11月23日第54期第四版“反动老保新人大总部有组织有计划挑起武斗大事记”中说：

十一月十一日晚新人大公社以所谓“五一六”分子的莫须有罪名，非法绑架了我三红新闻兵团战士王坤（昆）顺同学（自二月至七月在《红旗》杂志任记者，记者站过去、现在都认为王的表现是好的）。新人大公社总部主要负责人赵桂、张祖义、唐玉琼亲自指挥，组织了几十个人，埋伏在西校门附近，卡车停放在万泉庄，派人骗王昆顺到西校门电话室接电话，把他绑架走。以陷害攻击三红。”

《新人大》报1967年11月29日第五十期第四版“人大地下黑党委操纵人大三红总部挑起大规模武斗罪责难逃”中说：

十一月十一日晚，他们出动大批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铁器、棍棒等凶器，把南一楼围得水泄不通，围攻我新人大新闻系同学宿舍，非法绑架了我新人大战士扈X X、徐X X、王宝刚（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及一名看门工人。在对上述几位同志进行一顿拳打脚踢之后，便于十二日凌晨一点钟把扈、徐、章三人绑架到三红总部，进行严刑毒打，用砖块猛击我新人大战士头部，用木棍狠捣他们的脊背，用铁棍打他们腰部，十几人轮流打嘴巴，踢腹部，使我新人大战士当场昏死过去。这样毒打一直达三小时之久，后放出扈瑞清、徐珠宝……

三红围攻南一楼抓新人大三人毒打，显然是对新人大抓王昆顺的报复行动。

第二类：抓对方队伍中的所谓坏人，抓出后大打战报。对方队伍坏人多，对方自然是坏组织。

据1968年6月《新人大》报第67期第二版“本报编辑部就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答全国各地读者问”一文记载：

我公社坚持彻底革命大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去年到今年三月，连续揪出了潜藏在我校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二百六十余人，其中人大三红的骨干、“优秀战士”和“革命领导干部”就有二百二十余人，占百分之八十五。

最近……我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取得了四月大捷和开门红，仅在校内就从三红总部揪出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四十余人，其中包括操纵三红总部的地下黑党委的五个别动队——现行反革命集团，有一个是与台湾美蒋有直接联系、与地下黑党委二头目崔耀先和反共老手朱真有密切联系的全国性反革命组织。

至此，从三红中揪出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达二百七十人左右，已占三红总人数的百分之十。

去年以来，我们也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清除了钻入我新人大坏人三十余人，纯洁了阶级队伍，巩固了组织。

据1968年6月8日《人大三红》第63—64期第二版“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人大的伟大胜利——彻底砸烂操纵人大公社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一文记载：

两年来，以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革命造反联络站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向盘踞在我校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及其卵翼下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发动了持久的猛烈的攻击，稳准狠地打击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取得了与敌斗争的辉煌战果。

截至目前，经过核实，人大共揪出阶级敌人254名，其中由我人大三红揪出的就达236名，占全部的92%。同时，我人大三红无产阶级革命派还从人大公社揪出《梭镖》、《万里长征》等××个现行反革命小集团，大力协助专政机关破获了数起重大反革命案件。此外，我人大三红也清除了混入自己队伍中的33名坏人。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人民大学的伟大胜利。

在我人大三红揪出的236名阶级敌人中，从人大公社正式成员中揪出的就占一百二十多名其中包括副科长以上的“领导干部”41名，“教职员”59人，“工人”21名。

第三类，抓对方骨干分子，抓住后暴力教训，以从气焰上打击对方、瓦解对方。例如：新人大抓三红总部的作战部负责人谭立清。

李德山：“（谭立清）是骨干，外联组组长。每次三红和新人大谈判，他都是代表。谈了几次，口齿利索，口才好，外交能力强。”

在1967年11月29日《新人大》第五十期第三版“崔耀先的‘第三种势力’论和三红总部的‘和平颠覆’活动”一文中谈到了谭立清当时的情况：

朱真等人从青岛回校后，立即向三红总部传达了崔贼关于争取“第三种势力”的指示。九月十日，在三红总部核心组扩大会议上，朱真等人同三红总部主要负责人孔宪龙、刘庆库、安维华等人共谋如何执行崔贼指示，经研究后，决定在新人大内部制造反对派，搞策反活动。

经过一番策划后，三红总部作战部负责人谭××亲自出面，把他们早就打入

新人大公社的内部的几个人拉出去，拼凑成一个以“斗肖”为名，斗赵（桂林）为实的“斗肖联络站”。于是，新人大内部的第一支‘造反大军’就分娩出来了。

由于谭立清的得力策反工作，给新人大军的军心造成很大动摇，所以颇遭新人大忌恨，新人大就找机会抓住了他，并打得非常严重，听说“人已经废掉了”。又因为谭立清是“孙泱之死”专案组三红一方代表，他被抓被打以后新人大就被三红抓住把柄，说是新人大蓄意破坏调查，心中有鬼。（详见后 《人大三红》1967年11月23日第54期 第四版 “反动老保新人大总部有组织有计划挑起武斗大事记”）

1967年的9月至11月底，两派之间抓人打人的情况两派都有详细记录，当然是张三说李四的，李四说张三的。

《新人大》报记录的是：

在孙泱特务叛徒集团操纵下，人大三红总部……公开破坏革命大联合，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内战，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全面攻击我新人大公社。他们的高音喇叭竟一天广播十二小时以上，连续地谩骂攻击，……

他们疯狂地破坏“四大”，肆意撕毁我公社贴出的大字报大标语，割断我公社许多广播线。

他们连续不断地寻衅闹事，挑起武斗，大打出手，企图用武斗挽回他们政治上的失败，几次组织人冲击我公社总部。他们非法绑架我新人大战士，私设刑堂、严刑拷打，逼问我新人大总部工作人员的名单和专案组人员的名字，竟强迫写认罪书；仅从10月6日到9日被三红中一小撮暴徒非法绑架、严刑拷打的新人大战士就达20余人，大部分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见《新人大》1967年10月29日第四十八期第二版“人大三红总部休狂”）

十一月十一日晚，（见前 略）

十一月十二日中午，在东风二楼农经系同志住处，三红出动数十人，非法绑架走我新人大农经系战士李亚模，当我部分战士赶去抢救时，遭到这伙人的毒打

十一月十四日中午，我新人大新闻系战士林长青、田润光两同志在经济系食堂买饭回宿舍，半途就被三红一伙事先埋伏好的人打碎饭碗，抓入南一楼。他们

头戴柳条帽手持凶器，准备大干，我新人大战士闻讯后去了二十余人，在六处一排前向他们喊话，希望他们立刻释放我新人大战士。他们不仅不予释放，反而出动西面几个系的全部三红打手，向我战士扑过来，与此同时，三红广播台又大叫大嚷，从东边几个系调来二百余名全副武装的打手，跑向南一楼，进行武斗。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我公社战士当即撤回。

但是，这样流氓打手（共约三百余人），在三红总部坏头头刘庆库和三反分子付秋涛的女儿付民族的亲自指挥下，疯狂袭击我新人大历史系同学的住处——五处，他们见人就打，砸破了五处大部分门窗，抢劫所有的财物，包括被子、衣服、钱、粮票，手表、箱子、资料等等，使国家财产和个人财物，受到严重破坏和损失。接着，他们又袭击我新人大广播台所在地北一楼和北二楼。

在此过程中，这样暴徒，对我新人大战士进行了残酷野蛮毒打，惨绝人寰，目不忍睹。请看事实。

我新人走战士王力生（经济系二年级二班同学），赤手空拳，在北一楼前被三红政治部负责人韩崇勋（国政系三年级学生）用三尺长二、三寸宽的大刀猛砍三刀，头骨被砍裂，身上的棉衣、绒衣被砍透，臂彼砍伤，鲜血浸满衣服，当场被砍倒住地上，有生命危险。

新人大女战士隋木兰（经济系一年级一班同学），被三红一伙打手抓住后，先提着隋转了几圈，特隋昏倒在地后，用脚猛踩隋的乳房和下身，当场踩出小便，并踩昏过去，内部受伤，现伤势极为严重。

新人大战士洪登书（历史系同学）被三红一伙打手抓住以后，一顿毒打，便按住洪登书同志（下转二版）头部往人工湖水里溺，企图把洪登书同志溺死。后又往南楼拖，进行毒打。

我新人大战士、修建科工人殷牛，在五处一排看到我战士被绑架、毒打，他前去解救，被三红一伙打手，用棍棒猛击头部，当场昏倒，鲜血直流，这伙打手还不甘心，在已昏死的殷牛同志头上、身上，又狠狠地打了若干棍，现殷牛同志卧床不起。

我新人大战士、修建科工人王德林，配电室工人赵玉智头部均被打破重伤，配电室工人刘绍丰同志腿打得不能走动，计统系同学王敏比同志生殖器被打坏，睾丸被打肿，不能走动，卧床不起，工人张聚嘴被打坏、重伤，历史系同学古火

金头被打破，眼部被打重伤。

这群暴徒在洗劫五处、冲打北一楼以后，便回各系，继续行凶，在东风楼财贸系，我战士练优芳吃晚饭，就被三红一伙打手绑架到宿舍，手被打破。我几名战士去抢救，也未能幸免。计统计系鲁东原同志晚上回东风三楼睡觉，刚进屋，就被三红一伙打手抓去，一顿毒打。

十一月十五日早晨，在东风一楼工经系宿舍，三红一伙打手，又强行绑架我新人大战士、工轻分社负责人梁志玉同学，一面毒打，一面强梁志玉同学写所谓“认罪书”，手段极为卑鄙。

据不完全统计，在三红挑起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中，我新人大战士被打伤五十多人，其中重伤近二十人。国家财产遭到很大破坏，五处共六排近百房平间（间平房），大部门窗、电灯、家具被破坏，新人大公社的资料和战士个人财物被抢劫；许多战士除只身一人外，衣被财物全被抢光，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在三红总部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下，我新人大战士数百人无处居住，都拥挤在总部大楼。为保证将我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部分被三红无理赶走的新人大战士决定搬到红一楼我新人大战士的房间去住。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我部分新人大战士刚进红一楼，该楼的三红战士就无理挑衅，不让我新人大战士进红一楼。此时，三红广播台大叫大嚷，大肆进行煽动，调动数百名三红战士手挥大刀长矛把红一楼围得水泄不通，打伤我战士，并用砖头石块冲砸红一楼，扬言要把我们“消灭干净”。这次武斗，三红一小撮暴徒又打伤我战士数十名。（见1967年11月29日《新人大》报第五十期 第四版“人大地下黑党委操纵人大三红总部挑起大规模武斗罪责难逃”）

《人大三红》报记录的是：

新人大公社社长赵桂林、作战部副部长黄达等不断挑起武斗。据不完全统计，从九月初至十月底，新人大公社共挑起十一起武斗，打伤我人大三红战士三十三名。绑架了亮相在人大三红一边的革命领导干部朱真同志，砸了我三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都揪邓联络站、首都哲学批判联络站、三红法律兵团资料室、经济兵团资料室。

十一月一日 中午新人大公社数十名工人、学生、教员在职工食堂绑架并毒打三红战士肖明，并抢走十余元钱。三红战士闻讯赶到，救出肖明，撤退时，新人大公社又调来近百名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用砖头、煤渣块砸伤我三红战士多人，重伤五人，其中站在一旁观看情况的我研研究所三红战士王朝文被他们用石头、木棍把头部打破五个窟窿，露出头骨，当场不省人事，另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三红战士张起瑞从医院看病回来路过此处，被他们用煤块把头砸破，在医院动手术时，煤渣陷进很深，见到头骨。与此同时，我三红战士张扬同志由商店买菜回家，走到二处六排，被新人大公社武斗于将、被我公安部拘留过的大流氓葛占圈率领一批打手围住殴打，张扬同志的小孩及路过的附中红旗战士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也被殴打，葛还叫嚷：“什么他妈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公然侮辱我们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下午一时半，三红国政兵团战士卢锁岭同志路过原图书馆北门，又被葛占圈拦住殴打，当场昏迷过去。二时许，新人大公社调集数十名社员用大杠将我三红工人宿舍二处一排大院西墙二十余米全部推倒，将砖头运至北五楼，并将三红战士宿舍玻璃全部打碎。当三红战士前往劝阻时，又遭毒打，三红战士张桂荣、张宴宾等被打伤。六时半左右，新人大公社在城内铁一号的四十余人预先埋伏好，当由西郊开去的交通车一到达，他们就蜂拥而上，毒打刚下车的三红战士，蒋培坤同志被打昏，吴贵庆同志被打重伤。之后，又将我三红住城内联络站工作人员赵剑敖同志拖出毒打，并纠集一伙人，到三红战士宿舍前叫骂，打碎玻璃，进行威胁。

十一月二日 新人大公社撕毁了十一月一日卫戍区同志主持双方总部达成的关于采取措施不再挑起武斗的协议，又挑起武斗事件五起。再次洗劫三红政法兵团资料室、档案兵团“春雷”办公室，打伤我三红战士数人，重伤一人，轻伤二人，非三红战士一人，其中，档案系三红战士冯乐耘的小腿被打成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函院教员万钟民（非三红战士）仅因在新人大老巢北一楼前马路上散步，便遭绑架毒打，从下午四点一直打到六点，并威胁说：“你不老实，我们开水马上浇好，烫你的屁股。”“我们还有电刑，给你过电”“你是下午来得让你活着出去，如果上午来就别想活着”。打完后，又威胁万钟民说：“我们没有打你，今天抓你是革命行动，你出去如果造谣污蔑，小心你的狗头！我们新人大打狗队，专打你们。”

十一月三日晚 新人大公社策划组织四百人冲砸三红总部办公楼。因对行动时机有分歧，当夜没有动作，新人大公社扩大武斗班子，编为三队，一队是数十名工人组成的“巡逻队”，完全脱离生产，集中在新人大总部居住，白天睡觉，夜间活动，他们头戴柳条帽，眼戴铁丝编的防护镜，口戴大口罩，身穿厚棉衣，手持长矛铁棍，对三红进行偷袭；一队是数十名学生组成的“棒子队”，集中在新人大总部居住，全副武装，专门搞武斗；一队是“红色少年大队”，专门打砸抢。当天，新人大公社办公楼还进行了消火栓喷水演习，并运石灰等武斗物品。

十一月四日晚 新人大公社三次袭击六处三红宿舍，一次袭击二处一排和三排三红宿舍。

十一月五日下午，新人大公社后勤部长赵钰（原伙食科长）领人去修建科铁工组赶制长矛、

大刀和匕首。晚上，新人大公社袭击二处一排和林园楼三红宿舍，洗劫三红经济系和农经系办公室、资料室。

十一月十一日晚（见前略）

十一月十二日晚 新人大公社砸抄了我三红国政兵团的两间办公室。

十一月十四日中下“孙泱之死”联合调查组三红首席代表谭立清同志接到家电噩耗，上系秘书处办理回家路费手续，路过文化革命广场，被新人大公社突然绑架，遭到新人大非法审讯和严刑毒打，用橡皮裹住身体猛打，不留痕迹，谭遍体鳞伤，昏迷不醒，经医生多次会诊，半身已瘫痪，脑缺氧，水肿，数次窒息，生命垂危。下午二时，新人大又绑架了三红函院兵团战士张阁林同志至北二楼，剥光衣服，蒙住眼睛、吊起来轮番拷打，并用开水烫背，然后用凉水冲。随后将张丢在马路上，张全身血肉模糊，两腿寸步难行。下午四时，新人大公社又调动数百名战士，手持铁棍木棒，袭击我三红新闻、经济等兵团战士宿舍，打伤我战士四十三人，重伤者十五人，其中住院七人；同日又抢劫我三红工厂工人自用自行车七辆，在路上劫抢三红经济灶炊事员自行车一辆。

十一月十五日晚 七点半，三红农经兵团战士张玉振、何天福去急诊室看病，被二十三名埋伏好的新人大暴徒打倒在地，蒙上眼睛，拖到北二楼毒打，何、张被打得四肢不能动，张随身带的二十八元人民币和笔记本也被抢走。同日晚，新人大暴徒冲入函院兵团战士龚维丽（女）家，数人用强光手电刺她眼睛，其他人

用乱棒毒打。同日晚十一点多，一群新人大暴徒又砸破函院教师邝鸿的门窗，用乱棒毒打邝鸿夫妇二人，邝当场昏倒在地。这群暴徒骂邝“装死”，又将邝拖至北五楼，狂叫：“你小子还未死”，又毒打了一顿，邝头部被打破，脚趾骨被打断，同日晚，新人大一群暴徒抄了三红战士李华、崔今是同志等十几户的家，把他们强行赶走，这些战士至今无家可归，衣食无着，我三红战士崔今是的六十多岁患有癌症的母亲（崔本人不在家）亦不能幸免。

十一月十六日 下午四时许，新人大公社调动五六十名暴徒，头带柳条帽，手持铁棍、木棒，配合事先埋伏于楼内的数十人，强占红一楼（教工宿舍，内住三红战士及其家属一百余人，位于学校东大门左侧），企图控制学校大门，并对三红总部大楼形成包围圈，割断东风楼和林园、一处、二处三红战士联系的通道，以便对各住区三红战士各个击破，最后围攻三红总部大楼，他们一进楼，便安装电话，以便听新人大总部指挥，他们事先通知住在红一楼的历史反革命傅介声搬家，新人大还帮他搬，并护送大右派吴景超搬出红一楼。随后，新人大公社又增调数十名暴徒，运进大量砖头、瓦片、煤渣，把楼门堵死。十五日遭新人大毒打成重伤的函院教师邝鸿，刚从医院回来住在红一楼，这时又被新人大关押、毒打，人大三红战士时运凯的爱人从东北来到北京生孩子，产后只有十七天，大人小孩身体均很弱。可是，这群法西斯暴徒兽性大发，连生产只有十七天的小孩、大人都不放过。破门闯进“月房”，大开消防用的水龙，喷射冷水，满地灌进二寸深的冷水，冻得大人小孩浑身发抖，娘两个又惊吓又冷，都得了重感冒。当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把产妇背出来之后，产妇的爱人想再进去拿些小孩和产妇的日常用品，新人大的一小撮坏头头开头就问是“新人大”的还是“三红”的。一听是三红的就坚决不准进去。红一楼内三红战士宿舍全部被砸，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人大三红战士闻讯赶到，新人大暴徒从高处用砖头、瓦片、煤渣砸我三红战士又用消防水龙头冲。楼里灌进几寸深的冷水，水里通电，接着，新人大公社又调来数百名打手，安装探照灯，开来土坦克（用汽车改装，装置铁板）作掩护，向我三红战士发动数十次进攻，三红战士被打伤二百二十人，重伤四十五人。

十一月十七日晚，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在卫戍区同志主持下谈判，就在谈判过程中，新人大坏头头指挥新人大棒子队、少年流氓大队，抄砸六处我三红战士宿舍，发生武斗。

十一月十八日在卫戍区首长的主持下，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双方达成了“制止武斗协议”。但协议墨迹未干，新人大公社的坏头头黄达、赵桂林之流就伸出黑手，一把把它撕毁。当晚，黄、赵指使一批暴徒，明目张胆地砸毁了住在二处三排九号、十四号、十九号，北四楼下八号的三红战士宿舍，并对这些三红战士进行了残酷的毒打。十时后，黄、赵派出部分暴徒，强行进驻林园一、三、七、九楼。深夜至凌晨，新人大一批暴徒连续袭击我三红六处六排学生宿舍。连日来他们不断派人对我三红进行骚扰，在光天化日之下，惨无人道地毒打我三红战士制造流血事件。”（见《人大三红》1967年11月23日第54期 第四版“反动老保新人大总部有组织有计划挑起武斗大事记”）

一时间校园内血雨腥风，两派同学都不可能再在自己本班本系原来的宿舍混合居住了。以共青团路为界——三红一派学生、教职员集中到了学校的南侧，教学大楼南面的南楼等处居住；新人大一派学生、教职员集中到了学校的北侧，图书馆大楼北面的北楼等处居住。

在“一一·一一”三红围攻南一楼、“一一·一六”新人大攻占红一楼两次严重武斗事件之后，虽然十一月十八日在卫戍区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制止武斗协议，要求：双方无条件地“拆除全部武斗工事”“交出一切武斗工具”“不准以任何借口抓对方的人”“已抓者一律释放”“一律搬回原单位、原住处和原来办公位置”“恢复到今年八月份的情况”……

但是，在两个山头依然同样被中央文革认可，两“大王”仍旧同存并立的情况下，“涛声依旧”——山头各自为政，群众各听各派。至11月底割据基本定型，“楚河汉界”势成，为武斗今后的进一步升级摆开了战场。

人大武斗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备战加剧到激战终结，时间自1968年3月27日打倒“杨、余、傅”起，至8月22日第三批军宣队进校，取缔群众组织止。

1968年3月27日，中央文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发出的结结巴巴、语音难辨的新的动员令：

这个大革命已经进行快两年了,经过了几个大的战役,经过了几个大的回合,这里不说还有一些小的回合。现在大概可以说我们第一个大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在这个回合的战斗中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了。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在这一个回合战斗中,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了!第三个回合,就是击溃了去年二月所兴起的二月逆流,这是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发动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这个二月逆流击溃了,(口号)二月逆流是彻底的破产了,(口号)彻底失败了!有一些极少数人企图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妄想!这是第三个回合。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家伙是变色的小爬虫,他们使用各种方法钻到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把它挖出来了,把它们挂起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战斗的回合,就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面貌,把它们打倒了,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小爪牙,关、王、戚的后台。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中央文革号召向新暴露的敌人——“杨余傅反党集团”发起新一轮冲锋。

震源裂变,震波涌动。已被割裂肢解的人大校园,气氛再次凝重欲炸。《人大三红》1968年5月22日第61期,在第三版发表了《是谁打响了第一枪?》一文。文章说:

“三·二七”大会以后,人大公社的武斗准备逐渐达到了高潮。据人大公社武斗队黑头目李德山供认,在三月底,他们就非法盗用修建科仓库大量钢材,打制长矛一千多支、匕首四、五百把。四月份又拆掉校园四周的铁栏杆作钩镰枪。并非法砍伐大量树木;出动大卡车装运砖石;动用公款17万元购置武斗用具。四月二十七日晚八时许,他们竟然在交通股一带试验了炸药包、毒气弹。

对此，新人大在1968年6月《新人大》报第67期第三版文章“究竟是谁打响了武斗第一枪？”中反驳：

五月十日，他们在得到解放军宣传队即将离校集中学习的消息不到两小时，就用法西斯手段非法绑架贫农出身，曾经参加过八路军的我新人大革命工人李德山同志，从而打响了武斗第一枪。这是他们继四月二十五日公开对抗解放军制止武斗的广播讲话、四月二十八日非法抢走幼儿园儿童口粮13656斤和四月二十九日非法抢占办公大楼之后，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他们从三月下旬以来，在他们的黑后台杨余傅揪出来以后，就长期策划的大观模武斗，终于在他們一手挑动之下爆发了！

两相对照，凸显出事态变化的两个节点：“三二七”之后的备战升温 and “五一〇”之后的战幕重开。两节点背后隐现的问题是：是时军宣队在哪里？此刻的卫戍区军宣队为何缺位？

上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双方尚能在卫戍区的主持下，签订制止武斗协议。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还来校做过视察，检查协议的落实执行。1968年2月16日《新人大》报为当日第二批军宣队进校而出特刊。文中追记了两个多月前第一批军宣队进校后“支左不支派”的工作：广泛深入调查研究、耐心细致思想工作、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革命大联合。

三月，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突变“新反党集团”成员，卫戍区下派各校军宣队应当只能是原地停摆，不知何所。于是，校内仅存的一点居中调和力都已失效，两派故态复萌，新一轮的“抓黑手”角逐开始。直至五月十日第二批军宣队离校集中学习，权力位置彻底真空，三红迅疾抓走新人大方面武斗队的主力工人李德山，双方夺人大战，互指对方“打响了武斗第一枪”。

自此，启开其后的“五·一一”、“五一二”“五一四”“五一七”“五二二”……恶斗连续升级、不可遏制，终至将一派同学打死五人！

1968年6月《新人大》报第67期第三版“究竟是谁打响了武斗第一枪？”文载：

五月十一日下午一点,他们派出大批法西斯暴徒,非法抢占、洗劫了教工家属宿舍,并非法强占东大门,下午三点,他们又公然派出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暴徒,公开抢,我社在五处的广播喇叭,大打出手!接着他们又非法强占并肆意毁坏电话总机,抢劫收发室,非法绑架和残酷毒打我新人大战士,甚至惨无人道地施以电刑,进行逼供信。崔老妖和法西斯反动臭老保人大三红总部,就是这样得寸进尺,打响了武斗的第二枪。

五月十四日凌晨二时半,他们大开杀戒,公然派出数百名武装到牙齿的暴徒,抢劫和破坏校工厂国家财产,偷袭和杀伤我新人大工厂大队护厂战士,并且狠下毒手,残酷地用长矛刺死前去保卫国家财产、抢救阶级兄弟的我新人大优秀战士王锡中同志,又一次挑起了大规模武斗,打响了武斗的第三枪。

五月十七日中午,他们又抢劫并捣毁了我校体育用品仓库,打响了武斗的第四枪。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我新人大战士为了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新人大战士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在北楼一带修筑自卫工事。法西斯反动臭老保人大三红总部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动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武斗专业队,分别以数十人一队,从他们的总部白楼、留学生楼、南楼、六处等地,集中接近到我修筑自卫工事一带埋伏。他们的坏头头刘庆库亲临现场,进行策划。当他们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拉响警报器作为进攻的信号,在反革命杀人犯李德山的直接指挥下,主动向我修筑工事的新人大战士发起冲锋,打响了武斗第五枪。

在他们挑起的武斗中,反革命杀人犯李德三(山),魏玉(雨)庆等亡命之徒,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人大三红》第71期《新人大报》红3号1968年8月4日合刊第三版“反革命武斗狂的罪恶史”文载:

从“三二七”至四月中旬,赵桂林之流进行武斗挑衅,据不完全统计,达十四次之多。他们非法绑架、残酷殴打许耀钧、高承宗等三红战士多人,甚至赵桂林还亲自率领数十名武斗打手,冲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严重打伤我三红女战士姜化英等三人。

.....

四月二十五日晚，他们强占了我三红档案兵团和研研究所兵团办公室；

四月二十六日，他们大规模抢修总部大楼武斗工事，在交通股开办武斗食堂；

四月二十七日晚，他们在交通股试验炸药包，在此前后，他们多次派人外出盗买军火、炸药；

四月二十八日，他们非法邦架、毒打我三红战士黄茂祥。拆掉校工厂铁栏杆，赶制杀人凶器；

五月六日晚，他们突然袭击六处六排我三红战士宿舍，打伤三红战士二名。

.....

五月十日晚，他们就借口我人大三红揪出反革命分子、一贯打人行凶的坏蛋、人大公社战斗专业队头目李德山，悍然调动大批武装暴徒强占林园小楼，绑架和毒打三红战士孙占升，将长期卧床养病的三红女战士王纪霆的双腿活活打断，洗劫我十一名三红战士宿舍，许多家属、孩也惨遭毒打，从而一手挑起了从五月十日开始的全校性大规模武斗。

五月十一日，赵桂林之流又倾巢出动，强占家属住宅林园1-9楼、一处：、二处、四处、.北五楼、医务所、幼儿园、图书馆、校工厂以及职工食堂。他们疯狂破坏国家财产，毁坏房屋，大肆抢劫职工财物，绑架、毒打我三红战士陈沅等同志，连老人、小孩、孕妇也不能幸免。他们甚至大耍流氓，将附中女学生××按倒在地、企图强奸。真是奸奸淫掠夺，无恶不作。同日下午，他们又出动全副武装的暴徒一百多名突然袭击南五楼和六处学生宿舍，打伤我三红战士二十多名，其中重伤五人。

.....

五月十二日，赵桂林之流将校工厂我三红战士全部用武力逐出厂外，破坏了校工厂抓革命、促生产的正常进行，肆无忌惮地赶制杀人凶器。为了制止赵桂林之流的罪恶行径，我人大三红“横扫千军”战斗队于五月十四日凌晨采取革命行动，取缔了人犬公社这个制造杀人武器的地下兵工厂。赵桂林之流出动大批武斗专业队员，手执长矛大刀向我三红战士猛扑过来，使我战士多人负伤，一手制造了“五一四”反革命血案。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赵桂林之流趁我20余名三红战士在我方住区内修

筑自卫工事之机，集合200余名全副武装的暴徒，配备了摄影记者、啦啦队、担架队、医疗队，分三路猛扑过来，妄图一举将我20余名三红战士置于死地。我三红战士由于事先毫无戒备，当场有数人受伤，被这伙暴徒逼到了一个大深坑前，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不得不奋起自卫，结果造成双方数十人伤亡。十分清楚，“五·二二”大规模流血事件，完全是赵桂林这流事先精心策划的，他们不仅是杀害我三红战士的凶手，而且是杀害人大公社战士的罪魁祸首！

……

……焦头烂额、穷途末路的反革命黑党委及其走狗赵桂林之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七月二日凌晨悍然向我三红和新人大革造站住区连投十余颗手榴弹，并用步枪、土炮连读射击，当场打伤我战士多人，这样，赵桂林之流就在人民大学开创了使用军火武器的恶劣先例。直到中央“七三”布告发表以后，他们还几乎每天都向我三红和新人大革造站住区放枪开炮，几乎每夜都在试验高级的杀人武器，严重地威胁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破坏了首都革命秩序。

1968年的六、七月间，北京各高校校园尽成武斗战场，各校两派相互杀砍，所用武器上升到真枪实弹。道路上常有满载头戴柳条帽、手持铁矛枪“战士”的卡车疾驰而过，那是到其他院校驰援。

7月27日夜，最高领袖亲自派遣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攻入清华大学，终结了这场荒唐的北京高校大武斗。

8月2日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入校，两派头头集中办学习班，学生、教师各回各系，群众组织自然消亡。

据披露，1966年12月26日大领袖73岁生日时，他和江青请了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一千人吃饭，席间曾举杯祝酒：“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他对于“全面内战”是合于心意、乐观其成的。

最高领袖的理想程序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而必须实施“天下大乱”的基本前提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最终的结果必须是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消灭。“走资派”彻底消灭之时，便是“天下大治”实现之日。在这个预设前提下，各个革命的群众组织无不争先恐后。

为彰显自身的革命彻底性竭尽所能的对立面打成“反动臭老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恶斗，何能达到“天下大治”，只会招致“天下更乱”。

在无可收拾的情况下，最高领袖只有实行他的绝对权威“武力清场”，于是有了727工人宣传队的进驻清华园。最高领袖最终抛弃了他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心爱的造反派，造反派烟消云散却并未寿终正寝。而后，在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等各种名义之下，紧跟伟大领袖，不惜以千百万被打倒的走资派、政治贱民的鲜血和生命为铺路石一路践踏过去的造反派，最终使自己双手沾血、成为被整肃的对象。指使者与冲锋者的“蜜月”结束了，这就是所说的“毛用了造反派两年，整了造反派八年”。

文化大革命中由北京在校的老五届大学生中产生的高校红卫兵组织及代表他们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例外），曾经是伟大领袖的爱将、干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同龄人，因为按照正常学龄，他们是在建国以后，1949年至1953年期间入小学读书的，即受过完整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教育。这中间哪些是“封资修”教育，哪些是“红色教育”，另做分析。明确的是，在他们中间绝不缺乏“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士。问题在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他们的热血被放在了谁的祭坛？

【述往】

新人大公社地牢中的酷刑

刘炼

1968年7月2日中午，老二苗挺从人大附中“复课闹革命”回来，喜形于色地对我说：“妈妈，‘新人大’一个学生到学校找我，叫我转告您，明天可以回家去取东西。”孩子们高兴地跳起来，都要跟我去，各自拿他们想带出来的东西，男孩子们要拿象棋和连环画，女儿要拿电光纸。我则要取些毛衣和生活用品，特别是想把缝纫机搬出来，以便给孩子们缝补衣服。母亲则要我取出毛线和织毛衣针……我们开列了一长条清单，虽然马上又要搬家，尚不知去处，但有机会先搬出些东西再说。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带了两根粗木棍和绳子准备抬缝纫机，五个孩子兴致勃勃地从西边一个小偏门绕到学校北门，刚转过街角，远远地我看见“新

人大”揪我的专案组成员×××（三年级的一个学生）半截黑塔似的站在北门外。我知道上当受骗了，忙对孩子们说：“不好，他们要抓我，我们赶快回五处去。”我指挥孩子们扭头就走。×××断喝一声：“刘炼，你哪里去？赶快滚回来。”这时已有两人追上来，我知道跑不了了，就对孩子们说，“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婆婆，我大概回不去了，你们想办法给我送洗漱用具。”孩子们吓坏了，五双大眼睛望着我。小女儿拉着我的衣襟不放手，男孩子们说：“妈妈快，我们一起回家去。”这时我顾不上他们，更怕他们跟着我吃苦头，看着这群孩子，我心头一阵酸楚，用力推开他们，扭转身挺起胸膛，迎着来的灾难和凶神恶煞的造反派，从容地走过去。

这时红卫兵上来扭我的胳膊，我用力甩开说：“我跑不了，我会自己走。”他们把我带到图书馆一间屋子里，我问：“抓我来干什么？”他们说：“这一阵子你好逍遥啊，躲到五处让我们找不到你。”我说：“你们把我扫地出门，我无处可去，是你们让我搬到五处去的。”他们就骂我投靠“三红”，企图让“三红”保我。我说：“无稽之谈，你们为什么骗我来？”他们中一个人态度突然和蔼起来对我说，“叫你来是想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一愣，他接着说：“你住在五处一定看见‘三红’进行武斗的工事，在什么地方布置了多少人，你老实告诉我们，有你的好处，我们要说明‘三红’是掀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我断然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们不许我们看，把窗户都封死了。”他们不信，硬让我写材料，我不写，他们态度就凶起来了，说我包庇“三红”，保护“三红”。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其实我是从你们的防区过去的，你们的工事我倒是亲眼看见了，你们打通楼层、封锁楼道等等，但‘三红’没有人问我，即使问我，我也不会说一个字；同样，我在那边看见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因为我反对你们打内战搞武斗，我绝不介入你们的武斗，我不会写一个字给你们的。”他们语塞，就蛮横起来，转了话题，说我“敬酒不吃吃罚酒”，要把我押到地下室关起来，明天就发我的“战报”，并说发现了我的新问题，是个真凭实据的“大特务”。我吃了一惊，之后又平静下来，认为他们是恐吓我。但由于我的不合作，我是回不了家了。我转而一想：如果合作就会放我么？肯定不会，我决不用原则作交易，坚持反对武斗的立场不动摇。

之后他们就把我的眼睛蒙起来，上上下下，七拐八拐，把我带到一间灯光耀

眼的大房间，所有的窗户都用三台扳钉死，不漏一丝光亮，使我不知方向，不辨昼夜了。掀开眼上的黑布后我才看清大房间里靠墙一边竖放了一排单人床，已经住了几个人。看管我们的是幼儿园的保育员，其中一个曾带过我的小女儿，我真是哭笑不得：幼儿园的保育员没事干了，被调到这里当“狱卒”，这个世界太荒唐了。她们也认得我，态度比红卫兵好得多，要我解下腰带和身上的小刀剪、钥匙串等物品，交她们保管，说是“为了我的安全”，大概是怕我自杀吧——这是多虑了，我绝不会走那条路的。

地牢管得很严，不准互相交谈，不准在室内走动，只能整天坐在床上。日本、国民党监狱中的囚犯每天还有放风的时间，我们却连晒太阳的权利都被划夺了，我被关押两个月期间，没有见过太阳和天空。日光灯日夜亮着，我无法入睡，只好用一块黑布蒙着眼睛睡觉。饭由保育员送来，顿顿中窝头、咸菜。上厕所要两三个人凑在一起，由保育员监视，这是我秘密交谈的最好机会，因为监管人员只在厕所外边等候。上厕所要上一层楼，经过几个大厅，有时大厅门开着，我看见里面陈放着许多铁书架。这座图书馆刚刚落成，尚未启用，就搞起“文化大革命”，许多书成捆地堆放在角落里或堆放在窗前当作“工事沙包”。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铁书架也作为审讯吊打“囚徒”的工具。

白天没事干，他们就指导我们学习毛主席两篇文章——一篇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篇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并要求背下来，谁背不下来就在床边罚跪。我怕罚跪，读得很用心，背得一字不差。但有几位难友总也背不下来，就被连日罚跪，一跪几个小时，我真替她们着急。我虽然能流利背下来，心里却十分抵触，暗自生气，认为叫我学这篇文章是岂有此理，莫名其妙：我早已成为“阶下囚”，何来“投降”问题？我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丈夫的面也见不到，我去向谁“靠拢”？武斗期间被赶得无安身之地，校门都出不去，说什么“突围”呢？我越读越生气，今天想起来，真可笑自己那时竟然如此认真地联系实际“活学活用”，徒生烦恼。

同室难友中我只认识两个人，一位是经济系资料员屈真。我悄悄问她为什么被抓来，她说：“我也不知道。”后来审讯时总问她爱人的问题，才明白她是受了“株莲”。她爱人是校级领导干部，党委宣传部长，曾被“三红”保过，所以新人大偏要打倒他，当然老婆也不能幸免，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每天晚上九

点钟就来提审她，我真为她担心，一夜不能入睡，不时从黑布下面看看她是否回来，只要床空着我就睡不着。每次她都是早晨五六点钟才回来，脸和眼睛都被打肿。她偷偷告诉我，不按他们的意愿回答问题，他们就打她。

另一位难友是孙泱的夫人石崎，似乎没有人理睬她。上厕所时我问她，“孙泱自杀你知道吗？”她流着眼泪抽泣地说：“知道。”但她绝不相信孙泱会自杀，因为那时孙泱还能出来自己打开水，和她约好每天晚上八点钟在水房碰面，秘密交谈几句。孙泱死前两天还对她说：他们整他是为了打击朱老总，孙泱曾做过朱德的秘书。但孙泱告诉石崎，他坚信党的政策重视证据，他的问题定会查清楚，党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并要石崎保重，照顾好孩子。因此，石崎说孙泱绝不可能自杀。孙泱死后，他们又抓了石崎狠命地斗争她，把她推倒在地痛打她，她的头撞在水泥地上，撞断了两颗门牙。后来他们把她单独关押，故意把窗帘绳和剪刀放在窗台上，暗示要她也自杀。她说：“我偏不死，我一定要看看他们的下场。”他们的阴谋未得逞，就把她关押到这里，之后就没有人提审她了。

再一位是学校总务长孙锁存的夫人，我原不认识她，她没有什么文化，是位家庭妇女，只知道发愁和哭，不知为什么抓她来，她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放不下心。她视力很差，患有青光眼，忧郁和哭泣使她的眼病更重了，一只眼几乎失明。我们每天听到楼上打人和嚎叫声，以及铁链的撞击声，大概是有人戴着脚镣吧，她就哭着说是她的丈夫，她听出亲人的声音。见此情景，我既愤慨又同情，一个无辜的家庭妇女，他们也不放过，真是毫无人性。

一天，他们七手八脚地又搬来一张床，我想大概又抓来什么人了。下午听到《骑兵进行曲》响起来，说幼儿园抓出了一个“敌人”。我原不介意，睡梦中被嘈杂人声惊醒，我不敢张望，从蒙眼布下看见推进一个人来，好可怕的样子，两眼肿大青紫，像两个大核桃，原来是幼儿园副院长张洁。我原和她很熟，现在几乎认不出她了。现在连幼儿园也卷进来，人大已没有一块净土了。我问她为什么揪她，她也说不知道。

最令我发指的是一位姓戴的女医生的遭遇。她已退休，自己开私人诊所，从不过问政治，只因她的亲戚刘×是人大教师，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分子，她被牵连，从校外抓来关在这里。那位教师我早就从广播中听到他的“战报”，被野蛮毒打双腿致残。戴医生的专案组负责人就是这个地牢的“牢头”，一个马克思

主义哲学课讲师×××，此人凶狠无比，脚蹬一双木屐，“呱嗒呱嗒”走来，一听到这个声音，戴医生就吓得尿裤子。我亲眼目睹她被毒打的样子。

她几乎隔两天就被提审一次，天亮拖回来，养好伤再打。他们逼她承认参加了刘×的“反革命集团”，她说“不是”，他们就用乒乓球拍左右抽打她的脸，一个晚上竟然打碎了六个球拍，早上回来时，她的脸肿得像个篮球，眼睛都看不见了。审讯时，凶手们一边抽烟一边用烟头烫她的脸和手，烧出一个个黑洞。用凳子的一只腿压她的大脚趾上，两个壮汉猛地一踩，脚趾盖立刻掀翻，血流如注。又叫她跪在铺满煤渣的地上，腿弯处压一根木棍，两个壮汉一边踩一边逼供。或是用绳子捆着两手大拇指，吊在书库铁书架上，用钢鞭抽打她。尤有甚者，他们用布条浇上化开的沥青，点上火后贴在她的手臂上，待沥青将凝时猛地一揭，臂上整张皮被撕开，然后他们再在伤口上浇盐水，她疼得昏死过去，他们就给她包扎好养两天再弄另一只手臂。每次送她回来，都像拖回一具死尸。她躺在地上不让人扶她起来，用微弱的声音说：“糖水糖水……。”我们赶快泡一杯浓糖水喂她喝，她才慢慢缓过气来。她是医生，知道低血糖昏迷要喝浓糖水。我一生没见过这么野蛮的酷刑。1976年我到重庆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看见用沥青撕皮的刑法，叫作“披麻戴孝”，才知道他们是从国民党反动派那儿学来的，我真不明白怎么这些人变得如此残忍，玩忽人命，不择手段。

开始几次她被殴打时，我还替她出主意，说：“再打你时你就说：《毛选》第四卷第1305页中说即使是对犯罪分子审讯工作也必须禁止使用肉刑。”谁知，她讲了这些话，被打得更凶了，我真后悔教她用毛主席的话来自卫，反而害她吃了更多的苦。这位戴医生的灾难，至今深深印刻在我脑海中。她能大难不死真是奇迹，后来放她走时，她双脚肿得穿不进鞋子，把布鞋剪开当拖鞋，蹒跚地离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过了几天，我也开始被提审了，也是晚上九点钟。我被带出囚室走进一间平房，里面灯火明亮，已经有好几个人等在里面。我巡视四周，认出了好几个人，有的是我教过的学生，其中还有两个教师。我的专案组都是历史系的造反派，有一个一年级的红卫兵，一脸凶相，粗声粗气，腰间皮带上总挂着一条铜丝鞭和一把有皮套的匕首，使我想起电影里审讯革命者那些打手们。这个房间似乎是放体育用品的储藏室，屋角堆着垒球棒、网球和各种运动器械，他们坐在几只白木箱

上，我站在屋子中央，背后站着两个人。他们开始审问我，第一句就问我，“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重大问题？”我愣了一下说：“_什么重大问题？我所有的问题都交代过了。去年9月到11月又写了许多材料，那些也是重大问题吧！”他们一起吼起来说：“是问你，别装傻，你是想摸底吗？”我说：“不是，是不明白什么叫作重大问题。”主审人×××说：“我们发现了你的新问题，你要老实交代。”我说，“没有新问题，一切历史问题，包括读书会、桃源社问题都反复交代过无数次了。”他说：“你没有听见我们发的战报？”我说，“没听见，前两天我们屋里的广播给切断了。”他说：“好，我就告诉你，你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要老实交代。”我先是一惊，立刻断然否认：“什么？什么特务组织？我从来参加过！”他们生气了，乱吼起来骂我装糊涂，抗拒坦白，并对我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心里说，二十年前我参加土改时，审问那些地主就知道这些政策，还用你们来开导我？他们见我说不出来，就说：“今天先给你出这个题目，你参加了什么特务组织，谁发展你，你又发展了谁，回去好好想想，明天老实交代，”就送我回牢房了。

第一次没有打我，我平安地回到地牢后，她们都很吃惊，说我运气好。我苦笑说：“重头戏怕是在后面呢！”我整天苦思冥想：什么新问题呢？什么特务组织？他们大概是在唬我，借以整人，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样挨到晚上九点钟，他们再次提审我。这次气氛大不相同了，专案组成员个个扎着皮带，主审者腰间挂了匕首，我心里“咚咚”跳起来，心想他们大概要动武了。

主审人先问我一整天想起来了没有？我说：“实在想不起来，我从来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能否提示一下？”他生气地说：“提示你算是你交代的吗？好吧，我告诉你，有人揭发你参加他们的组，有很多人。这个人你弟弟都说你认识。你自己交代了，我们会从宽让理，否则……”说着他拔出匕首，一刀一刀削他坐的木箱，木头一片一片落在地上，看来匕首很锋利，一会儿就削得满地木片。我看见他的武力示威反而生起气来，心想：恐吓我也不怕，没有的事就是没有。他举着匕首威胁我说：“你交代不交代？”我控制一下激动的心绪，平静地说：“我确实想不起来，我从来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你们既然掌握了许多材料，你们按材料定案好了，我不能随便乱说。我若编造个什么组织，编错了你们不会信，还要我供出同党，造岂不害人又害你们奔走去外调，浪费国家资财。因为没有这回

事，只为了自己过关少吃苦，说假话是不对的。”我原以为我这番合情合理的话会唤起他们一点儿理性，不料更惹怒了他们，一起对我吼起来：“谁要你编造，谁要你说假供，你这是攻击造反派，攻击革命小将，”我身后的打手已按捺不住，抄起垒球棒打我的后背，我没有提防，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他们揪住我的头发，按下我的头让我站好，然后几个人用电线拧成一头呈球状的长棒，狠命地打我的背、腿和胳膊，我咬紧牙，忍住剧痛，一声不吭。打了一阵子，我看见主审者示意停下来，他又问我：“你说不说？”我说：“如果打能使我招供，我早就说了，何必找打，况且是历史问题。毛主席过去在《论政策》一文中说‘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你们为什么用殴打来逼供？你们按证据定案好了！”他怒气冲冲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说：“你果然是历史系最顽固的人，你总是有理。我告诉你，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说着他扬起手中的匕首，用刀尖对着我的喉咙，说，“你知道学校死了多少人？”我已感到冷冰冰的刀尖压刺得喉咙疼痛，他抖抖手腕说：“你说不说？你不承认就宰了你，我只要刺进五公分，你就白死了，你信不信？”我挺直了腰，头往后仰，闭上眼睛，突然意识到自己已面对死亡，这是一群毫无理性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时我的思绪如万马奔腾，东突西驰，一忽儿是何思敏血淋淋的眼球，一忽儿是戴医生笆斗大的脸。我确信如果我被刺死定是白死，他们会编造出“畏罪自杀”的假象。我怎样面对死亡的威胁呢？我想起电影里对革命者暴力逼供的镜头，想起面对刺刀视死如归的老多乡们。我想为了保卫党的利益，保卫自己对党的忠诚和人格的尊严，我决不能求一时之安而屈服于暴力。想到这里，我岿然不动，但眼角流下了思恋的泪水。别了，干之！别了，妈妈！别了，孩子们！我是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死，原谅我吧，亲人们！我等着，等着，一声不响，好一阵子只感到刀尖微微深刺了一点儿，随即又放松了，背后又被电线球棒打起来。我这时睁开眼睛，看见有人拿起垒球棒，一个教员用眼光示意那个学生不要用垒球棒打我，于是那个学生扔下垒球棒，转用苍蝇拍抽打我，大概是把我当作“小小寰球”上“几只苍蝇”了吧，刚从死神处回来的我竟然差点儿笑出声来，急忙咬着下嘴唇，抹了一把脸，低下头，不让他们看见我的眼泪，误认作示弱。我的倔强使他们毫无办法，这一幕暴力逼供的闹剧就此收场，只勒令我写材料，我就把过去写过的问题又写了一遍应付他们。

这次地牢逼供也引起我深深地思考。我否定了是专案组为了整我而编造故事的想法，开始猜想是被什么人诬陷了。如果真是如此，我将遇到更大的麻烦，很有可能因调查不清而拖延时间，出牢无望，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这期间我从看守人员闲谈中听到我家的情况，一个姓陈的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说：“何干之家的东西随便拿，书可真多，有人把你家的书从二楼阳台上扔到小车上，一车一车拉到海淀去卖，衣服也一箱箱地搬走。”言者无心，却被我听到，这一下可真是扫地出门了，我们今后可怎么生活呢？这不是抄家而是公开抢劫和掠夺——事实果真如此，我们所有不舍得穿用的新衣，以及小孩子的衣物，都被洗劫一空——后来落实政策时，我连是什么人抢劫都说不出来，只能说当时守楼的是国政系学生和赤卫队，让抢劫者自我谴责吧！

之后他们又提审我几次，仍无任何进展。不知为什么渐渐地没有人来理我们这些“囚徒”了，我们的生活暂时平静了几天，但思念亲人和孩子的心情却浓烈、纷扰起来。我夜晚常做噩梦，有两次梦很奇怪：一次是梦见干之也被关到地牢里拷打，戴着脚镣“哗啦哗啦”地响，还似乎听见他痛苦的呻吟声。他脸色煞白，眼镜被打掉了，我大叫：“别折磨病人，他有心脏病。”哭醒了还听见我自己的喊声，遮眼布都湿了。看守人问我怎么了，我不作声，用被子蒙住头。那影子在我眼前闪回，不肯退去，我想也许是因为听见那位总务长挨打的嚎叫声引起的吧。我出地牢后，不久听到专案组的人说，我被关进地牢期间，干之果然被带到教学大楼地下室去审讯过。教学大楼地下室是“三红”的审讯室，因张春桥一次讲话中说30年代上海党是假党，两派都要揪干之去审问，被“三红”抢了先。干之一口否认这些诬蔑之词，他们就把他带到教学大楼地下室去，地下室的看门人问专案组“是否要采取特别措施”，意思是要不要施刑。专案组吓唬了干之一顿，又把他带回南五楼去审讯了。

又一次是梦见孩子们到颐和园去游泳，最小的儿子丁萌11岁还没有学会游泳，竟被大浪卷进漩涡没了顶。我又一次惊叫醒来，流着泪对看守人说：我惦记我的孩子们，希望能让我回家看看一家老小。她们虽然同情我，却无法帮助我。我找机会对我的专案组提出这一要求，他们说：“你老实交代就放你出去。”我只好把痛苦的思念深深埋在心里。后来我回家后，孩子们过了好久才无意中说出了一次险情，果然是弟兄几个到颐和园游泳，先在浅水区游，后来两个哥哥带着

小弟弟游向深水区，突然水深踩不到底了，小儿子惊叫起来，挣扎几下就沉下去了，一个哥哥去拉他已经够不着他的手了，就大声呼救，幸亏救生员及时发现，迅速将小儿子救起，不然他就淹死了。

这两个梦为现实所验证，令我惊讶不已，这大概是亲人梦魂萦绕，第六感官相通吧？

这愁闷难挨的不见天日的生活终于有了尽头，8月22日，久无声息的大喇叭忽然响起来，我们听到振奋人心的消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了。我们大喜过望，似久盼的甘露飘然而至。我想宣传队进校总不能允许这些凶手们如此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吧，他们是来执行党的政策，是来制止武斗的，对我们这些人的冤案也定会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听到广播，我们公开谈起来，看守人员也不加制止了，对我们的态度也和蔼许多。

第二天宣传队就接管了地牢，我原以为会立刻放我们回去，不料那两个人来“训话”时，面孔冷冰冰的，只说他们初进学校，不了解情况，要大家不要急躁，容他们把情况弄清楚后再决定怎么处理，并要大家填写基本情况。我大着胆子问地牢里的情况可不可以反映，他们说当然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要趁机报复。我听了心里凉了半截，看来我高兴得过早了，他们当然先听取地牢负责人的汇报，首先把我们看成“罪犯”。但我不管这些，还是详细地写了一个材料，揭发他们对戴医生实行野蛮酷刑的违法行为。不料，第二天宣传队的代表当众“训话”说：“革命群众对你们专政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忠心，对你们罪行的愤慨。当然打人是 不好的，但这是革命群众出于义愤。你们应当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不要否定革命群众的革命性，有些过激行为是难于避免的。”我听了很生气，断定这个宣传队不会真正执行党的政策，就不再写材料了。但我想念母亲和孩子的心情却按捺不下，8月25日写了一个简短的申请报告交给他们，这个条子底稿我保存至今。报告说，“今年5月16日‘新人大’占领林园七楼，我全家被赶出，指定我们搬到五处四排，后来五处成为‘三红’辖区。‘三红’命令我于7月3日搬走。当天我被‘新人大’扣押在这里，至今不知我的家人搬至何处，听说可能搬到六处。我有五个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8岁，我母亲已74岁，患有心脏病，我爱人何干之由历史系‘三红’看管，我很不放心一家老小，希望宣传队代我查询我家人的住处，并通知他们给我送些日用品来（脸盆和肥皂）。让

我见他们一面，问问家里的情况，不知是否可以？”他们一直推脱，说等回到系里再说。这样一直拖到9月初才放我们各回原单位。

回系之前给我们放了一次风。两个多月不见天日的眼睛一下子接受不了耀眼的日光，我们都捂住眼睛，过了好久才慢慢适应，看清周围的环境。这是图书馆大楼一个四面封闭的小庭院，直通地下室。地上长满荒草，堆满乱石块，似乎很久没有人管理了。后来我多次到图书馆去找我们昔日的“囚室”和这个小方庭院，但始终没有找到，似乎它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愿如此。❏

选自刘炼《风雨伴君行：我与何干之的二十年》第八章第三节。

此书1998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述往】

从挨斗到干校

唐孝纯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我们外语教研室被评上了本校先进集体，也有同志评上了北京市先进个人。先进个人是叶迂春（他非常正直，英语水平挺棒的，大家挺佩服他，在文革中他自杀了）。

正好在集体积投向上、很融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之前已经有一些情况。文革开始后，学校里的中层干部普遍地被打倒了。我爱人夏加曾经担任过图书馆副馆长，书报社也是他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一手办好的。文革中他被打倒了，我那个时候也是到了边缘。人家说“你参加夏加的批斗会去”，“斗夏加叫唐孝纯去”。我呢，在教研室里挨批，但原来大家都比较了解，怎么批得上去呢？当然个别“左”的也有，但我们是这么一个集体，对于我是什么情况，人家总还要看看实际情况，不能跟着外边的风。所以我在里面被批来批去，写检讨，但没有戴“高帽子”，没有“挂牌”。但我整个家庭因为老夏的那个情况，戴“高帽子”“挂牌子”、在校园里敲着锣批斗，什么都有。那个时候不说我们自己人格尊严完全没有了，就是小孩也遭受了大人冲击的影响。我在西郊集体学习，不在家，夏加是“走资派”，家里有一个保姆，被街道的红卫兵轰走了。三个小孩，最小

的只有七岁，两个姐姐带着，到晚上害怕啊。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我们在刘家站，孩子们在锦江上学，我们一个月回去一次，走很长的路见上一面。

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我们个人经受一些苦也没有什么。出发去干校之前，工宣队、军宣队在文化广场宣布：“你们就下乡去吧，你们一去就不复返了，人大就没有了。”我当时想，个人上下是小事，但人大从此停办了，我心里特别想不通。我下干校是比较早的，差不多是第一批吧。我去了以后，老夏才下去。老夏去的时候保姆还说：“你把小孩留给我吧”，他说：“不，我们艰苦就一块艰苦，大人跟孩子一块，我们不分开”，后来她说：“你把小儿子留下吧”，意思是给你们留个根吧，你们都死掉了，还留个后代在我这里。保姆是奶妈，三个小孩都是她奶大的，她这么讲是挺心酸的。但后来还是都去了干校。那个时候我们也做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老夏去的时候，锅、碗、瓢、盆等用大箱子装着，都带去了，书也带去了。书还是可以带，也可以看，但如要总看书，不好好劳动，当然会挨批，有的带去的也没看。

在干校初期政治学习很紧张，特别是军宣队在的时候，要“斗私批修”，要一遍一遍地背那些文章。我是紧张得不得了，一紧张全都忘了，幸亏长的文章没有轮到，短的轮到了，从头到尾背《愚公移山》这篇文章。在干校主要是劳动，我在地里采茶比较多，也插过秧。像我这样体弱多病的除采茶以外，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干过“轰鸡”，在瓢泼大雨里也挑过粪，基本上采茶还算是比较轻的。老夏他干什么都拼命，打石头盖房子，人家一天打三四块，他加倍。他有句话就是“活了干，死了算”，就是活着的时候就拼命干。采茶的时候，人家中午回来吃饭歇一歇，他采茶整天就在地里面，用一个毛巾缝的口袋，里面搁几个馒头、一点咸菜，吃晚饭都在地里。

在干校，起初我是被看成有问题的。一个是因为整个上海地下党被打烂，而我是上海地下党的；第二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因为我母亲跟宋美龄是熟悉的，他们就说俞庆棠“上着天、下着地”，而我也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学校工作过；第三说我还留过洋，是“美帝的特务”，有这三顶帽子。可能因为只是怀疑，并没有把我当成批斗对象，也可能我们教研室对我稍微软一点，如果把我推出去，早就被批斗了。后来到干校去的时候，我就低着头认真干活。从干校快要回来之前，教务处的副处长江农，那个时候在办子弟学校，做校长。我后来就在

那里教英文。等到临回来之前，江农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审查干部、做结论。我想他暗示我不是被审查的对象了，已经可以审查别人了。

后来，我在干校停办前就回北京了。回来以后，小孩们有分配工作的，有学习的。我就在“铁一号”跟一位同志一起审查住在“铁一号”的人的情况。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自己的问题差不多没事儿了。❷

【书摘】

人民大学是怎么被撤销的

郭影秋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适应革命和建设急需大量人才而建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均作出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0月3日举行开学典礼时，刘少奇、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党和政府领导人都出席了。少奇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办起来的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是没有的。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例子来办其他的大学”。可见人民大学在党和人民政府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人民大学自1950年成立以来，为我们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和贡献。虽然其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有时也走过些弯路，如建校初期全盘学习苏联有些教条主义，后来在政治运动中也有扩大化的错误，但就其主导面来说成绩则是主要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到文革之前它已逐渐成为一所新型的、独具特色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被中央列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校之一，在教育领域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但这样一所好端端的著名大学，在文革中却被迫停办直至被正式撤销，作为学校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对这样的决定大惑不解和深感痛心。尽管在停办、撤销过程中，我还没有重新恢复工作，且在病中，但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出过反对撤销的意见。当回天无力时，又对如何保存学校有生力量提出过建议。

人民大学究竟怎么被撤销的？对此，在一些同志的讲话或文章中，往往把它说成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四人帮’的勒令强迫”，等等。总的讲，

这样说也不为错，但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样的说法有些简单化。我认为有必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具体考察，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我曾经仔细回顾过人民大学被撤销的过程。

凡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文革的发生和发动，最初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是以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为切入点的，而后再是顺藤摸瓜揭露这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支持者和包庇者，就是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而，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各个高等学校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黑窝点”，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阵地”。很快，各个高校的领导人都无一幸免地被打成“黑帮”或“反动权威”，学校的教师也被打成“修正主义教育领域的吹鼓手”，当时的普遍舆论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学校与教师可谓斯文扫地，毫无尊严。

从1968年初开始，各个省市纷纷建立了“造反派”夺权的革命委员会，各个学校的文革也进入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农民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这段著名的“最高指示”成为当时各个学校进行斗、批、改的指导思想。继“七·二一指示”之后，毛泽东又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随之，向各高校派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8月中旬也进驻人民大学。

我后来知道驻人大宣传队指挥部早在1969年初就对人民大学是否还要办召开过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学校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老师和职工代表。这次座谈会后还印有《情况简报》，《简报》开头就说座谈会是“根据北京市革委会指示”召开的。北京市革委会既然指示开这样的座谈会，显然有其意向。有人还向我介绍，参加座谈会中的多数人都认为人民大学没有必要办，持这种主张的主要

理由是：学校原有专业设置与其他院校重复；有些专业如档案、会计、新闻、法律，根本没有在大学办的必要，办个训练班，培养几个月就行了；文科不能脱离实际，应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去培养。

今天看来，人民大学本身的教师和干部竟然主张“人民大学没有必要再办”，所持理由似乎荒诞不可理解。但如置身当时的时代就一点不奇怪。因为毛主席说的“大学还是要办”主要是指理工科而言，自然可以理解为文科大学可办可不办。持这种主张的同志或者是由衷之言，或者是在当时形势下的违心之论，但无疑都是学习领会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结果。包括所谓“培养一个成本会计用不着上大学，只要训练几个月就行了”的看法，因为“七·二一指示”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嘛。

当然，座谈会上也有少部分同志认为人民大学还有必要办。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国家大，国际任务重，还有国际培养任务，需要一批水平较高的人从事政治、经济理论工作，因此需要一所培养这种人才的学校。而且，文科大学还是要办一点，人民大学可以单独办，也可以与其他院校合办，但至少保留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理论课程。

应该说在当时形势下，能主张“人民大学还有必要办”的意见和想法已是难能可贵。不过，却不能成为主流意见。

值得注意的宣传队指挥部有明确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没有必要单独办，从现有12个系的专业来看，多数与其他大学重复，可以由上级领导机关统一调整合并。总的倾向是不再办。”应该说驻校宣传队指挥部的这种意见，对人民大学的停办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意见可以直接影响北京市委的决定。恰巧在1969年10月，教育部又通知：中国人民大学由原教育部领导下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领导。领导体制的这种改变，使北京市革委会就可以决定人民大学的命运。

果然，1969年10月，北京市革委会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事实上在停办的通知正式下达前，人大函授学院设在天津及太原函授站的房屋、家具及办公用品，就已由驻校宣传队作主，转交给当地。学校在北戴河的休养所的房产、家具则已全部移交至北京市革委会。而且，当时学校的教职员工因“一号命令”和“五七指示”，大部分都到了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整个学校已是人去楼空。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在当年迁入人民大学校舍。这些情况说明，在人民大学停办的通知下达之前，有关方面就已有停办人民大学的决定性意向。

继之在1971年1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关于高等学校调整问题的座谈会上，写出了《关于高等学校调整问题的报告》，按照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精神，提出了几条调整原则，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综合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人民大学即被列入撤销的院校名单之中。同年4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17年的教育工作，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同时认为学校的原有教师队伍当中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有名的“两个估计”。国务院科教组原来提出的《关于高等学校调整问题的报告》，将全国原有的417所高校，保留309所，合并43所，撤销45所，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这《调整报告》作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附件报送党中央，经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全国，人民大学的撤销成了不争的事实。

从回顾人民大学被撤销的过程中，我想大家可以得出结论，人民大学的撤销，固然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干扰破坏有关，但这并非是“四人帮”等干扰破坏的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它实际上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想下极左路线的产物，也是当时彻底否定17年教育工作的一个必然结果。

我虽然是文革前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但对于1969年1月驻校工、军宣队指挥部就人民大学是否继续办召开的座谈会及其《简报》在当时并不知情，因为当时我尚处在被审查、被批斗之中。上面所说的情况，都是后来在与吴德的交谈中才知道的。1969年7月，在周总理干预下我被“解放”，行动有了相对的自由。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吴德同志曾不时看望慰问我。在市革委会酝酿停办、撤销人大的过程中，吴德也曾两次向我打招呼，听取我的意见，做我的思想工作。第一次1969年10月作出停办人民大学的决定前期，他向我通报了工、军宣队召开座谈会的情况和他们的意见，我当时即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停办的意见。我再三说明学校的革命历史传统，强调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直接创办的一所新型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学校的干部和教师大多来自革命老区，经受过革命斗争的

实际锻炼，又掌握了系统的专业知识，还有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大多数干部教师都是好的。虽然这些年学校“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经过文革的洗礼，大家都有了认识，今后还可以继续改造和提高，还是能担负党和国家交付的任务的。我还强调专业设置重复不能作为停办人大的理由，拆散容易，聚集很难，不要只看眼前，还要从长远着想，请吴德等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做决定时要慎之又慎。尽管吴德表示可以向上面转述我的意见，但我看出来他自己也有些无可奈何，也就知道我的意见不可能有大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在此之后的1970年春节，学校的王俊义和郑杭生同志从江西干校回京探亲来看我时，我曾以沉重的心情对他们说：“看来人民大学要被停办已无可挽回，你们都还年轻，既要在顺境中成长，也要能在逆境中经受锻炼和发展。希望你们再回干校以后，能在艰苦的环境中付出更大的努力。要认真读书，多思考问题，在可能情况下能写一点有分量的文章，以使中央和有关方面看到中国人民大学这支队伍不可低估。”这些话多少反映了我当时的看法和心情。

在人民大学的撤销已成定局时，我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1971年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内蒙古大学校长于北辰同志在会议间隙来看望，向我转达人民大学将被正式撤销的情况。当时我就向他说这件事还值得研究，并向他说明人民大学的历史沿革、师资力量，图书资料丰厚（278万册），基础较好，聚集不易，散掉可惜，而且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都是好的，是能够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全国四百多所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教师，大多是人大的毕业生、进修生。我们八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保留三百多所高等学校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有人大这样一所高等学校。于北辰同志遂于1971年7月26日正式写信给当时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和副组长迟群，反映了我的意见。信中说：“前几天我去看望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同志，谈到人大撤销问题”如何如何。但这样的意见和反映已不可能被当时的领导所采纳。

人民大学撤销了，而学校的教职员如何安置呢？吴德同志曾向我说过，北京市革委会在1970年6月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对此提出的意见是：人民大学的教职员2313人，已有2/3去该校在江西余江县的“五七”干校。撤销后，在京的教职员全部去江西进行劳动锻炼，并将该校党政关系移交江西省。我当时感到人员安置涉及许多实际问题，是件复杂的事情。北京市革委会的意见，是

不是想甩包袱？要把人大这两千多教职工包括家属都交给江西，在江西就地分配和安置，会有很多实际困难，应该对人大的教职工持认真负责的态度。但吴德同志说，这样的意见已经报中央了。

我还知道，对于人民大学教职工的安置问题，当时就有人写信向国务院科教组反映，不料科教组有人批复说：“来信意见，不必向上反映，可按一般人民来信处理。至于如何合理使用原人大的师资力量则是应另行考虑的问题。”可见他们关于人员安置是漠然对待的。当人民大学的绝大部分教职员都到江西干校之后，学校的领导工作中心也转移到那里，还成立了“五七”干校临时党委和革命领导小组，学校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崔耀先任临时党委书记和领导小组组长。当他按北京市革委会的意见，向江西省委、省革委会研究磋商人大的教职员如何在江西分配安置时，江西方面感到人大的教职员中老干部多、党员多，大都资历老、级别高、工资多，人员数目也大，在一个省范围内难以消化安排。崔耀先当然知道人大的广大教师和干部也不愿意留在江西，都有强烈的返回北京分配工作的愿望。既然江西方面表示难以消化，崔耀先同志也就因势利导，向北京市及有关领导单位反映了这些情况和意见。那时，因林彪垮台，形势有些变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批准了人大干部教师回北京分配的意见，同时通知撤销了人民大学在江西的“五七”干校。这样一来，在江西的全部教工和家属才终于返回北京。

……

人大的教职工回到北京后，来看我的人很多，他们大都在这个学校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十多年，面对学校的撤销，自然有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他们都向我诉说内心的郁闷与今后何去何从的惶惑。我十分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与他们的内心都是相通的。鉴于我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与党内生活的经历，我一直在思考，像人大这样的学校，它的专业设置，干部和教师的政治、业务素质，难道党和国家今后就不需要了吗？客观环境和政治气候都常有变化，日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大说不定还能恢复，再办一个类似人大这样的学校也是完全可能的。在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面临再分配的情况下，如何保存和积蓄这批力量，如何避免这支队伍被零散地分配掉，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经过反复思索，和许多同志研究，逐渐形成了将学校的干部教师和各类工作人员按建制、成条块进行分配的设想。我主动请求与吴德同志交谈，向他说了这样的设想，再与学校其他领导

共同研究，将这些建议写成了文字建议和报告。幸好这样的建议和报告被上级领导单位同意，1973年人大原有的教职员工便得以按原建制、原单位为条块，分配到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单位，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及北京市委等。这样的分配办法，就为人民大学日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摘自郭影秋《往事漫忆》第十七章中国人民大学的撤销、恢复与重建

【书摘】

为什么解散人民大学

冯其庸

我是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的。回来后，到1973年6月，就给我落实政策，文革中加给我的罪名统统取消。但我被抄走的全部日记却一本也没有还我，原因是他们在我的日记上篡改了很多，作为我的反革命罪证，无法还我，所以由总支书记出面说已丢了，无法找回了，希望我不要计较。事实上我当时要计较也无从计较了。但由于这许多日记的丢失，有不少我的往事，我负债、还债的事，我的诗词作品（那时的诗词常写在日记上），还有我与许多学术前辈的交往，就统统无从查考了。

我们刚去干校时，“四人帮”原想把人大留在江西不让再回来了，据说当时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嫌人大老干部多，工资太高，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包袱，所以没有接受。最后人大仍回北京了。这虽是我的耳闻，但回来不久，“四人帮”就宣布人大解散，这说明“四人帮”确是要取消人大的。

“四人帮”为什么要解散中国人民大学呢？许多人都不明白。其实当时人大的教师大都是清楚的。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人大有一批老教授，老干部是从延安来的，都很了解江青的底细，江青就怕有人揭她的底。文革中，人大语文系的黄晋凯同志无意中从资料室所藏30年代上海的报刊上发现了江青当时的情况，因而被造反派狠批。当时“铁一号”传达室的一位老同志是长征干部，因为没有

文化，在人大传达室工作，他就多次骂过江青，说她不是好东西。这是我亲自听到过的。所以人大的存在对“四人帮”是一个障碍，让江青夜不安席。还有曲艺协会的领导陶钝同志，是山东诸城人，与康生、江青都是老乡而且很熟。江青的母亲去世后，还是陶钝帮她料理的。但文革中，在江青的授意下，陶钝首先被打倒了。“四人帮”垮台后，文化部组织一批老干部去参观山西大寨，其中有曲协的陶钝同志，舞协的胡晓邦同志，我也一起去参观了，这是陶钝同志亲口给我讲的。所以江青最忌讳的是别人知道她过去不光彩的经历，凡是知道她的底细的人，都会遭到她的迫害。中国人民大学在“四人帮”的统治下，当然不可能有好命运。

☐

摘自冯其庸回忆录《风雨平生》

【书摘】

人民大学解散前后

方汉奇

在干校的第二年，我们曾听说人大“五七”战士要在江西就地分配，又听说有关方面的领导曾为此和江西方面谈过，但没有被接受。一个理由就是人大的人级别太高，工资太高，江西承受不了，没法安置，人大的干部职工和教师有很多是从陕北公学、华北大学过来的，级别有的比县长、比省里的领导都高，省里不好安排，也安排不起。再加上当时的校领导，包括郭影秋、崔耀先他们有这么一个考虑：就是这支队伍不要打散，按编制整个序列地分割到几个学校，以便在适当时候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远见，事后证明这个安排是正确的。这个队伍只是稍有流失，个别人自行脱离人大，各奔前程。多数人像我们这样整个建制地下去了，整个建制地回来了。

当时下干校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不同来的准备了，觉得能在文革那么大的风浪中苟全性命就已经不错了，不必考虑再搞教学、研究那些营生了。当时觉得当工人、当农民也挺好的。可能有一些老干部、一些在党内已经有较长革命经历的，他们会有一些想法，而像我们这样的没有。因为当时我们这样的“牛鬼蛇

神”在政治上已经早已沦为贱民，一切听从安排，不敢有非分之想，只希望整个国家好、大家都好。☞

【资料】

还臭老保人大三红总部的本来面目

《新人大》 第56期

1968年1月12日

人大三红是由“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东方红公社”组成的。

“人大红卫队”由教工组成，是三红的核心组织。由中统特务林培黎等发起成立。

“人大红卫兵”是反革命两面派刘志坚操纵下在付秋涛家中成立的，当时把一面五星红旗撕碎作为袖章。

“东方红公社”是根据陶铸的“巩固领导权。扩大组织”的指示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由人大红卫兵、红卫队及其他人员（包括家属）拼凑成。

我们认为广大三红战上是要革命的，但三红总部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总部，它上保刘邓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下保我校一小撮，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现简介如下：

三红总部的头头是些什么角色

刘××——人大红卫兵发起人第一任总指挥，反革命两面派刘志坚的爱女。刘志坚通过刘××炮制并控制了人大红卫兵。刘××在南京还创立了保皇黑字兵。此人道德极其败坏。

林培黎——人大红卫队发起人。中统特务，黑帮分子林铁之子。

刘庆库——三红总部主要负责人，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被江青同志斥为“两面派”“和平颠覆队”“不像个学生”。此人从中学时代起，一贯玩弄女性，盗窃公物。因钻研黄色小说《金瓶梅》受到黑帮分子田汉的黑爪牙的精心培植。同系的三红战士也认为他很臭。

安维华——三红总部第三号人物，一贯道坛主的狗儿子，狂热高呼党内头号

走资派“刘××万岁”，在大街上狂呼“越南必败，美国必胜”的反动口号。（研究所教员）

王强铭——三红作战部副部长。小偷，破四旧时贪污手表两块、金戒指两个，等等。还偷盗同学衣物，被面多件，有的寄回家，最近又强奸幼女。

朱真——三红总部核心组主要负责人。前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反共老手，1957年又策动并伙同林希翎反党。已被我新人大公社揪斗。

崔耀先——操纵人大三红的地下黑党委核心人物，三红幕后总指挥。前人大党委副书记。青帮分子，彭真死党，曾参与畅观楼反革命阴谋活动。早被我新人大公社揪斗。

孙泱——三红黑后台之一。前人大副校长。兰衣社大特务。1966年12月指使三红砲打康老。1967年2月要求加入三红。1967年9月16日江青同志指出：“红卫队员阎志民是孙泱在三红中的一只黑手”。操纵人大三红的地下黑党委核心人物。

聂真——操纵三红的地下黑党委核心人物，前人大党委第一副书记。现行反革命分子，已被北京卫戍区逮捕。曾指使三红反中央文革、反谢副总理、反北京市革委会。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6年11月，三红总部负责人伙同阶级异己分子赵遐秋收集、整理、印发攻击周总理的黑材料。

▲1967年1月21日，三红总部发出炮打康老的反革命号召，并召开大会小会进行动员和组织布置。

▲3月，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3月3日在人大的讲话。

▲4月——5月，三红总部伙同“5·16”反革命分子姚中原砲打周总理。

▲5月，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6月10日有关人大问题的讲话。

▲5月，扬言如果中央文革“××x倒台，我们要庆祝三天三夜”。

▲六月六日，当陈伯达同志6月5日批评了三红难兄难弟以后，三红以“天安门纵队”名义贴出“红色高压算什么反动巨幅标语”。

▲6月10日，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召开恶毒攻击林付统帅和伯达同志的反革

命黑会。

▲9月，中央首长9月16日指出三红保大特务孙泐后，狂叫“这是反党阴谋集团，把保孙的帽子扣到我三红头上”“××受蒙蔽了”“说我们保孙，又没有材料，等于放屁”，狂妄叫嚣要“把（中央文革）××揪来人大斗争”。三红总部政委孔宪龙在大会上公开叫“我三红要保谁，谁就保得住，保得坚决。”

炮打三军

▲1967年4月，三红总部派出大批人马流窜全国，冲军区，抓军内一小撮。

▲5月《人大红卫兵》报成都版两次发表声明“大抓军内一小撮”。

▲5月13日以后，成群结队去北京军区大院等地刷大标语，表示要与三军“冲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6月，三红总部发表声明，要揪广西军内一小撮。

▲7月，派人到福建揪斗中央多次肯定的福建军区负责人。

▲7月，在广州发起成立“战广州兵团”，反对广州军区。

▲8月上旬，以三红总部名义在长春发表声明，抓长春军内一小撮，大反黑龙江军区。

▲8月中旬，以三红总部名义在南京发表声明。攻击多次被中央肯定的南京军区负责人，大抓南京军内一小撮。

▲8月14日在周总理8月11日公开指出“抓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之后，《人大三红》报武汉版第一期叫嚣“改组后的武汉军区是假支左，真支保”“要彻底摧毁武汉军区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期造谣说：“抓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月，在温州发表声明：要抓温州军内一小撮。

▲8月，三红《工农兵》杂志第4期提出要掀起批判军内一小撮的高潮。

妄图颠覆红色政权

▲1967年4月中旬，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前夕，三红总部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大放孙逢一反对谢副总理的讲话录音，三红总部负责人声称，“孙逢一所说的就是我们要讲的”。他们还参与了反谢副总理的活动。

▲5月，对抗谢副总理关于联合斗争彭真的指示，单方面召开斗彭真的小会。

▲6月，公开冲击北京革委会机关报《北京日报》。

▲7月7日，发表《关于山西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攻击刘格平同志，妄图颠覆山西省革委会。

▲8月上旬，以三红总部名义在长春发表声明，猛攻黑龙江省革委会。

▲9月，参与颠覆北师大革委会的反革命暴乱。

▲x月，派人去上海反对以张春桥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委会。

大保校外一小撮

▲保反革命两面派陶铸。

▲把陶铸称为“陶大爷”。声称“陶铸同志是我们的后台”“陶铸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66年10月20日，人大红卫兵为陶铸在人大的讲话举行两周月纪念大会。

66年底，陶铸已被揪出，人大三红还狂妄叫嚣“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

▲保三反分子谭震林及由他掀起的二月逆流。

对我新人大公社反二月逆流的大字报拍照，搜集材料，准备秋后算账。

67年9月，公开为二月逆流翻案。

▲保黑帮分子陆定一。

▲胡说1966年前中宣传部的三大黑任务的一项《大事记》是根据《九评》精神写的，为陆定一开脱罪责。

保黑帮分子林铁、弓同轩、肖风。

林铁、弓同轩、肖风，通过林、弓的儿子，中统特务、三红红卫队发起人林培黎与三反分子崔耀先等伙同一起导演“孙央罢官”大阴谋。当我新人大公社揭这个阴谋时，三红诬为“阴谋的阴谋”。

▲保反革命两面派刘志坚。

把人大红卫兵袖章献给刘志坚。

刘志坚被揪出后，丝毫不揭发。

▲保三反分子刘寿彭。（原人大党委专职副书记）

吹捧刘寿彭是红线人物。

诬蔑我新人大公社揪斗刘寿彭是打击一大片。

死保校内一小撮

▲保大特务、前人大副校长孙泱。

67年2月，三红总部勾结“516”反革命分子张超，整理了所谓：“孙泱不是四类”的材料上报中央，准备解放。

《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发表后，三红总部邀请孙泱参加革命干部“亮相”会，动员孙“亮相”。

二月，红卫队负责人把总部的公开信发给孙泱。信中点名要孙勇敢冲杀出来造三反分子郭影秋、胡锡奎的反，封孙泱为革命领导干部。

压制对孙参与的“孙泱罢官”阴谋的揭露。

压制对孙泱从陆定一手中领来的反毛主席、反斯大林的《大事记》阴谋的揭露。

打死深知《大事记》内情的许惠尔。

给孙通风报信。

重用孙的黑爪牙。

67年9月17日前三红看管孙期间，为孙泱提供反革命活动的种种方便。

▲保大叛徒前人大党委第一书记胡锡奎。

三红总部把胡锡奎吹捧为“历次运动的左派”。

胡锡奎叛徒材料被揭露后，三红说“这是中央批准的，胡锡奎没有责任。”

诬蔑揭发胡锡奎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吹捧胡锡奎有“四大功劳”“五大功劳”。

▲死保并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前人大副校长聂真。

三红总部从不揭发，从不斗争聂真、自己不喊，也不准别人喊打倒聂真的口号。

称聂真是“同志”。

67年7月，三红档案兵团贴出大标语“彻底解放聂真同志”。

8月6日起、三红总部公然窝藏聂真达17天之久。

10月三红总部头头刘庆库当着中央办公厅同志的面叫嚷：“聂真你们打不

倒，我们三红就是要保”。

10月20日聂真被捕后，造谣说：“是为了保护聂真不被揪斗”。

▲死保并窝藏彭真死党、前人大副校长崔耀先。

66年6月13日，高喊“拥护崔耀先为首的校党委”。吹捧崔耀先是校党委中的左派。

67年2月、三红总部负责人孔××在三红大会上公开宣布要与崔耀先三结合。

4月，发表“篡权论”“三阶段论”，吹捧崔耀先是“红线代表。”

7月18日，把崔耀先藏进狗洞，并请他到三红广播台多次发表反革命亮相讲话。

9月，在崔主持下，在青岛召开地下黑党委会议，三红派所谓革命干部参加。

10月，声称“即使中央表态（崔是四类），我们也要干到底”。

▲把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前人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朱真抬为三红总部核心组主要负责人，尊之为精神领袖。

▲窝藏狗特务，前人大党委常委铁华，至今未放出。

▲窝藏“516”反革命分子，前人大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姚中原，至今未放出。

窝藏中统特务、红卫队发起人林培黎，至今未放出。

窝藏陆定一、孙泐黑爪牙，前人大研研究所副所长樊亢，至今未放出来。

▲死保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薄一波走卒范若一，对范言听计从。

▲死保国民党先遣军营长、前教务部总支副书记曹景春。

▲死保出卖鲁迅的大叛徒，语文系反动学术“权威”汪金丁。

顽固地打击一大片

▲把保守组织“八.一八红卫兵”的广大战士打成“落水狗”铁杆保皇分子”、大搞人人过关。

▲把革命组缴“人大红旗”“北京公社”“遵义兵团”等打成反革命组织。

▲把站在新人大一边的我校近80%的领导干部打成右翼势力。

▲把全校半数的师生员工打成否定历次政治运动的右派。

▲对不愿站在三红一边的许多革命领导干部实行抄家、斗争。

▲贴出大标语要揪斗已经造了反的站在新人大一边的前保守组织的某些负责人，按照陶铸的调子要把他们当成小刘邓来打。

▲把革命造反派、新人大公社负责人赵桂林同志打成“保皇派”“反党集团的乏走狗”“可能是5·16反革命分子”。向中央文革送了几十份陷害赵桂林的黑材料，最近三红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字报和广播稿集中火力搞赵桂林同志。

把我新人大公社打成保守组织“八一八的变种”“反党集团操纵的反动组织。

▲中央负责同志3·3讲话以前，一而再，再而三，打、砸、抄除三红以外的所有革命组织。

▲组织1·15夺权、2月夺权，剥夺三红以外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联合夺权等一切权利，把许多革命干部打成走资派。

独霸广播台，破坏交通工具、破坏校舍、家具。

▲设立集中营，非法拘留、审讯革命罪众。

3·3讲话以后，总部负责人主张以对待国民党的统战方针来对待新人大公社，鼓吹“打内战就是大方向”。组织专门打、砸、抢的专业队“红人大纵队”“七·二九战团”“文攻武卫战斗队”等。多次大规模冲击新人大总部，几次掀起武斗高潮。甚至吃掉我战士的一只耳朵。

私立刑堂，大搞逼供信，直至把人打死。

结 论

▲1967年3月中央文革首长在人大指出，人大三红的成绩与缺点是“四六开”“人大三红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胡锡魁的势力还在起作用”“孙泱有渗透”。

▲1967年5月，中央文革首长讲话指出“你们人大三红不争气”。

▲1967年9月16日中央首长斥责人大三红总部负责人刘庆库，是两面派”“是和平颠覆队”“人大三红里有许多特务”“人大三红保的就是个大特务孙泱”“阎志民是孙泱伸进三红的一只黑手。”

求实战斗队

【资料】

是谁打响了第一枪？

《人大三红》 第61期

1968年5月22日

五月的人大风云突变，一场大规模武斗发生了。这场武斗是谁挑起的？是谁打响了第一枪？

去年十一月份，操纵人大公社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武斗阴谋被我人大三红粉碎后。他们并没有死心，反而继续变本加厉地进行武斗准备，多次无端寻衅，挑起武斗，先后绑架、打伤我三红战士数十人。

“三·二七”大会以后，人大公社的武斗准备逐渐达到了高潮。据人大公社武斗队黑头目李德山供认，在三月底，他们就非法盗用修建科仓库大量钢材，打制长矛一千多支、匕首四、五百把。四月份又拆掉校园四周的铁栏杆作钩镰枪。并非法砍伐大量树木；出动大卡车装运砖石；动用公款17万元购置武斗用具。四月二十七日晚八时许，他们竟然在交通股一带试验了炸药包、毒气弹。

与此同时，人大公社肖黄赵方之流加速“移民并村”，再三强令全体社员搬家。另外，他们还把武斗队派往××学院进行专业训练和演习。

在舆论反面也加紧准备。他们把三红广大革命教员统统打成“黑教师爷”“胡锡奎的徒子徒孙”，狂呼乱叫“血洗红卫队”“剥红卫队的皮”“把红卫队的头割下来当球踢”等血腥口号。四月二十二、二十三两天，人大公社连续召开武斗动员大会，赵桂林亲自登台煽动，“号召”人大公社战士要在武斗中“经得起考验”、要“立新功”。他们的广播台也连日狂叫要将我人大三红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消灭在武斗之中”。

仅从三月底到四月底，人大公社就数十次非法绑架、严重打伤我三红战士。四月十六日，人大公社一、二号坏头目赵桂林、王鹤鸣甚至亲自出马，率领武斗队在解放军宣传队办公室打伤我三名女战士。其中姜化英同志头部被击破，血如泉涌，四肢痉挛，昏迷不醒。

四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大公社武斗队连续三夜破坏我东方红广播台。共盗走喇叭八个，电线一百多米，毁坏了全部线路。

人大公社武斗队还多次乘卡车公开闯入北大参加武斗。他们的双手沾满了新北大公社革命战友的鲜血。

我人大三红战士最听毛主席的话，一贯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作出了不懈努力。在人大公社的严重武斗威胁面前我们始终坚持了这一严正的立场。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动老保人大公社肖黄赵方之流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终于在五月十日打响第一枪。他们一夜之内洗劫了十一家三红战士，并绑架多人；十二日上午非法强占林园楼，下午又出动一百多手执长矛、全身披挂的武斗队员攻打三红战士住区南五楼。一场全校规模的武斗就这样由人大公社挑起来了。■

红哨兵

【资料】

反革命武斗狂的罪恶史

《人大三红》第71期 新人大报 红3号合刊

1968年8月4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七月二十八日的接见以及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一九”通知的发布，像一阵阵浩荡的东风吹遍人民大学，给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鞭策，同时也宣告了反动老保人大公社赵桂林之流一贯坚持反革命武斗政策的可耻破产。

一、赵桂林之流是人大历次武斗的制造者

人民大学的武斗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它是和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而激烈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校反革命黑党委，这个万恶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及其操纵下的反动老保赵桂林之流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每当他们在政治上遭到惨败、走投无路的时候，总是要挑起大规模的反革命武斗。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战斗回合中，赵桂林之流为了死保大特务孙泐及孙泐为首的“亲爱的校党委”，一手制造了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六·一五”反革命武斗事件；在第二回合中，赵桂林之流为了死保他们“心中的太阳”、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在陶铸老贼的指使下制造了调动六百农民进

城镇压革命群众的“八·二〇”反革命武斗事件；在第三回合中，赵桂林之流和社会上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相呼应，在王关戚反党集团和我校反革命黑党委的操纵下，大搞翻案复辟，当他们遭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迎头痛击之后，气急败坏，连续制造了“一·二五”“二二四”“二二五”反革命流血事件；在第四回合中赵桂林之流为了死保他们的副社长、王关戚反党集团的黑干将、反革命分子肖前，以及他们的作战作战部副部长、大特务、大汉奸黄达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连续制造了“九一”“一一·一六”等一系列反革命武斗流血事件。我校反革命黑党委所操纵的反动老保人大公社赵桂林之流，是人大历次反革命武斗的挑动者、制造者，事实俱在，不容抵赖！

二、赵桂林之流是五月大规模武斗的挑起者

在文化大革命第五个战斗回合中，人大公社总部在杨余傅反党集团及其黑后台的操纵下，掀起了一股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反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搞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3.24”“3.27”大会宣告了杨余傅反党集团及其黑后台的死刑，也给了赵桂林之流和他们的主子沉重打击。为了摆脱政治上困境，他们又妄图从挑起大规模武

斗中寻求出路。

自三月份以来，赵桂林之流一方面积极参加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小集团所挑起的北大武斗，另一方面在校内大搞移民并村，组织和训练武斗专业队，他们盗用巨额公款购置武斗器材，他们大办地下兵工厂，日夜赶造杀人凶器，他们伐木运石、架设电网，紧张修筑武斗工事，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狂吠用“复仇的长矛、雪亮的大刀”“血洗、油炸、枪毙、消灭“人大三红，叫嚣要把三红战士的头“割下来当球踢”，疯狂制造了挑动大规模武斗的反革命舆论。

从“3.27”至四月中旬，赵桂林之流进行武斗挑衅，据不完全统计，达十四次之多。他们非法绑架、残酷殴打许耀钧、高承宗等三红战士多人，甚至赵桂林还亲自率领数十名武斗打手，冲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严重打伤我三红女战士姜化英等三人。

为了揭穿赵桂林之流挑起大规模武斗的反革命阴谋，及时制止大规模武斗的发生，我们4月25日发出了关于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书”，4月27日，我三红总部办公室发言人又发表声明，重申了我们4.25呼吁书的严正立场。但是，

我们这些的革命倡议却被赵桂林之流恶毒地污蔑为“和平经”“鳄鱼之泪”“艾奇逊的友谊”。他们非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厉地大搞武斗。

四月二十五日晚，他们强占了我三红档案兵团和研研究所兵团办公室；

四月二十六日，他们大规模抢修总部大楼武斗工事，在交通股开办武斗食堂；

四月二十七日晚，他们在交通股试验炸药包，在此前后，他们多次派人外出盗买军火、炸药；

四月二十八日，他们非法邦架、毒打我三红战士黄茂祥。拆掉校工厂铁栏杆，赶制杀人凶器；

五月六日晚，他们突然袭击六处六排我三红战士宿舍，打伤三红战士二名。

与此同时，赵桂林之流接连召开秘密会议，制定武斗计划，策划强占红楼、以及对三红战士断水、断电的阴谋并在武斗动员大会上号召人大公社全体战士要在武斗中“经受考验”“立新功”等等。

十分清楚，这时赵桂林之流蓄意挑起的大规模武斗已经箭在弦上。五月十日晚，他们就借口我人大三红揪出反革命分子、一贯打人行凶的坏蛋、人大公社武斗专业队头目李德山，悍然调动大批武装暴徒强占林园小楼，绑架和毒打三红战士孙占升，将长期卧床养病的三红女战士王纪霆的双腿活活打断，洗劫我十一名三红战士宿舍，许多家属、孩子也惨遭毒打，从而一手挑起了从五月十日开始的全校性大规模武斗。

五月十一日，赵桂林之流又倾巢出动，强占家属住宅林园1-9楼、一处、二处、四处、北五楼、医务所、幼儿园、图书馆、校工厂以及职工食堂。他们疯狂破坏国家财产，毁坏房屋，大肆抢劫职工财物，绑架、毒打我三红战士陈沅等同志，连老人、小孩、孕妇也不能幸免。他们甚至大耍流氓，将附中女学生××按倒在地、企图强奸。真是奸淫掠夺，无恶不作。同日下午，他们又出动全副武装的暴徒一百多名突然袭击南五楼和六处学生宿舍，打伤我三红战士二十多名，其中重伤五人。

尽管如此，我人大三红和新人大革造站本着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一贯立场，于五月十二日由二十五个兵团、纵队、战斗队联合发表《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重要通告》，但赵桂林之流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为嚣张，竟然对我人大三红和新人大革造站住区实行断水、断电。五月十二日，赵桂林之流将校工厂我三红

战士全部用武力逐出厂外，破坏了校工厂抓革命、促生产的正常进行，肆无忌惮地赶制杀人凶器。为了制止赵桂林之流的罪恶行径，我人大三红“横扫千军”战斗队于五月十四日凌晨采取革命行动，取缔了人大公社这个制造杀人武器的地下兵工厂。赵桂林之流出动大批武斗专业队员，手执长矛大刀向我三红战士猛扑过来，使我战士多人负伤，一手制造了“五·一四”反革命血案。

五月二十一日，我人大三红总部和新人大革造站联合发表《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立即恢复我校正常秩序给人大公社总部的公开信》。但是，赵桂林这伙反革命武斗狂们却用最下流、最恶毒的语言辱骂我们的公开信是什么“战犯求和”，“连一张手纸也不值”，并积极策划对我三红举行一次大规模突然袭击，来挽回他们在政治上和武斗中一败涂地的被动局面。五月二十二日下午，赵桂林之流趁我20余名三红战士在我方住区内修筑自卫工事之机，集合200余名全副武装的暴徒，配备了摄影记者、啦啦队、担架队、医疗队，分三路猛扑过来，妄图一举将我20余名三红战士置于死地。我三红战士由于事先毫无戒备，当场有数人受伤，被这伙暴徒逼到了一个大深坑前，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不得不奋起自卫，结果造成双方数十人伤亡。十分清楚，“五·二二”大规模流血事件，完全是赵桂林之流事先精心策划的，他们不仅是杀害我三红战士的凶手，而且是杀害人大公社战士的罪魁！

“五一四”、“五二二”事件后，我们仍然以大局为重，于五月二十六日再次就坚决制止武斗、恢复正常秩序给人大公社总部发出公开信，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协商。然而人大公社总部赵桂林之流贼心不死，悍然拒绝了我们的建议，蛮横无理地提出“八项要求”，极其荒诞地要我人大三红把总部负责人、革命干部和革命教师交给他们“审判”“斗争”，并扬言要大搞反革命“武斗升级”，狂妄到了极点！

三、赵桂林之流是七月反革命武斗升级的罪魁

6月29日凌晨，我人大三红总部和新人大革造站发出了彻底砸烂反革命黑党委的统治机构旧三大部的进军宣言，掀起了一场彻底埋葬反革命黑党委及其统治机构旧三大部的革命风暴，给予我校一小撮阶级敌人以毁灭性打击。焦头烂额、穷途末路的反革命黑党委及其走狗赵桂林之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七月二日凌晨悍然向我三红和新人大革造站住区连投十余颗手榴弹，并用步枪、土炮连读

射击，当场打伤我战士多人，这样，赵桂林之流就在人民大学开创了使用军用水火器的恶劣先例。直到中央“七·三”布告发表以后，他们还几乎每天都向我三红和新人大革造站住区放枪开炮，几乎每夜都在试验高级的杀人武器，严重地威胁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破坏了首都革命秩序。

必须着重指出，赵桂林之流大搞反革命武斗升级，是经过长期准备、周密计划的。远的不说，去年十月，赵桂林曾勾结武汉新地校××X搞到手枪一支！去年十一月，赵桂林曾派人大公社总部政治部主任王家信等人去武汉偷运回数箱军火；今年年初，赵桂林之流强占我校危险品仓库及工经、财贸系的实验室，把毒剂和化学燃烧品抢劫一空；今年四五月份，赵桂林又派刘宏彬等人，三次去河北某地偷运炸药回京！今年五月，赵桂林之流与北京××学院坏头于××相勾结，抢劫国家军火库，盗用烈性炸药和雷管；今年六月，赵桂林又派王家信等人去武汉运回一批军火等等。赵桂林之流不仅是无法无天的反革命武斗狂，而且是厚颜无耻的造謠狂。特别在“七三”布告公布以后，他们为了掩盖其大搞反革命武斗的滔天罪行，逃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惩罚，于是就乞灵于造謠。明明是他们一贯非法盗买和偷运军火，却捏造了一个弥天大谎，胡说我人大三红去沈阳和武汉等地搞军火，并已被逮捕；明明是他们每天放枪打炮，每夜试验杀人武器，却每次照例在事先准备好广播稿，向我方提出什么“抗议”，真是无耻之尤！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三”“七·一八”批示及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一九”通知下达后，我全体战士欢欣鼓舞，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学习热潮，七月二十四日，我们又作出决定，号召全体战士坚决贯彻、全面落实；同时又一次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发出紧急呼吁。然而，反革命黑党委及其操纵下的人大公社总部仍一意孤行，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对抗“七三”布告和“七·一九”通知，继续不断地向我方住区放枪开炮，实在猖狂到了极点！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两年多来，人大公社赵桂林之流的全部行动证明了他们是穷兵黩武的武斗狂，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老保。他们在我校反革命黑党委这个万恶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操纵下做尽了坏事，如今武斗失败、阵营破产，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二八”最新指示敲响了他们的丧钟，他们最后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人大三红 解放台湾兵团/新人大公社革造站 金猴战团

【资料】

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

——再评反动老保人大公社总部“516”反革命《号召书》

《人大三红》第63、64期

1968年6月8日

解放台湾兵团 评论员

人大公社总部的“516”反革命《号召书》是赵桂林之流为我们提供的一篇极好的反面教材，应当感谢。我们之所以应当感谢赵桂林之流，不但因为这个《号召书》集郭孙胡李肖凌黄赵方徐为代表的我校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反动路线之大成，集中地反映了这个集团的反革命意志，公开号召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人大三红反扑，从而使得我们有理由去说服受蒙蔽的人大公社战士，还因为这个《号召书》胡诌了一篇人大前十七年历史和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郭影秋的“两条黑线”论发扬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正是使人大公社广大战士在两年来的两条路线斗争中站错队的思想根源。

两年来，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我校以人大三红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在人大的代理人郭孙胡李肖凌黄赵方徐为代表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正如毛主席最新指示所教导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然而，赵桂林之流却说，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黑线和黑线狗咬狗的继续，公然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唱反调，妄图从根本上否定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号召书》说：“红卫队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孙泐特务、叛徒、反革命集团垂死挣扎的必然产物”，是“保护旧人大的反革命工具”；“为了保护他

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于是“打着‘造反’的旗号”，组成了红卫队。这种论调似乎也能迷惑一些人。但是，红卫队造谁的反呢？按照赵桂林之流的逻辑，既然红卫队是“孙泐特务、叛徒、反革命集团垂死挣扎的必然产物”，那么，它就应该向着这个集团的“敌人”，即无产阶级杀过去。但是却不然，红卫队的同志在它成立前，就和三红战友一起，首先造了这个“集团”之首大特务孙泐的反，把孙泐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泐与陆定一的死党的关系、孙泐的三反言行直至孙泐的特务问题统统揭发出来，把他斗得狼狈不堪，威风扫地。不但如此，他们还把孙泐在我校的后台老板郭影秋揪了出来，把以郭、孙为首的旧党委打得落花流水。以致激怒了当时给“敬爱的孙副校长”上“万言书”，发誓“坚决站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校党委一边”的人大公社社长赵桂林及其将士们，非要把红卫队和三红的同志打成“反党分子”不可。而人大公社的“革命领导干部”当时还把反孙、反旧党委的革命大字报拍成照片，记下姓名，送给孙泐，为孙泐起草镇压革命的《六·八》黑报告，忙得不亦乐乎。两年来，红卫队一直同三红战友并肩战斗，打垮了人大公社的前身保守组织“八一八”和赤卫队，揪出了孙泐的狐群狗党，操纵人大公社的郭孙胡李肖凌黄赵方徐为代表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共计二百五十多个，到底应当怎样解释这些现象呢？

难道两年来，对孙泐及其同伙反得如此坚决，一反到底的红卫队，原来是“孙泐特务、叛徒、反革命集团垂死挣扎的必然产物”，而对孙泐及其同伙保得如此坚决，一保到底的赵桂林之流，倒成了“两年来”同“孙泐特务、叛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大的阶级斗争复杂到这般地步，实在令人不解。赵桂林之流不该忘记，红卫队和整个人大三红，是作为你们的前身保皇组织“八·一八”和赤卫队的对立面而登上人大政治舞台的。既然你们说人大三红的“核心组织”红卫队是“坏组织”，是“保护旧人大的反革命工具”，那么，你们打算怎样来评价人大三红与“八·一八”、赤卫队作斗争的历史呢？按照你们的历史观，人大的革命造反派与走资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岂不成了黑线和黑线的狗咬狗吗？

《号召书》还说：红卫队的“这些善于见风使舵、抓旗帜抢口号的反革命两面派”“打起了‘批郭’的旗帜，妄图暂时牺牲一个郭影秋、而达到保护十七年黑线、保护一小撮”“的罪恶目的”。

郭影秋是什么人？他是我校最大的走资派，原人大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六三年他来到人大以后，继承了我校前十三年最大的走资派、大叛徒胡锡奎的反革命衣钵，疯狂推行刘邓黑线，大肆扶右反左，是旧人大十七年黑线的集大成者，是旧人大一切反动势力在校内的总后台。造了郭影秋的反，抓住他所推行的黑线，正好顺流而上，把人大十七年黑线彻底挖出来；擒贼擒王，揪出了郭影秋，就可以把他卵翼下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反之，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我校两年来的斗争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怎么能够说，反郭是为了“保护十七年黑线，保护一小撮”呢？

其实，这并不是赵桂林之流的新创造，而是郭影秋“两条黑线”论的复活。郭影秋为了镇压人大三红，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抛出了反动的“两条黑线”论。他把人大的教工干部分成两派，一派以李培芝（叛徒）为首，通到旧中宣部，另一派以胡锡奎为首，通到旧市委。他说：人大前十三年的历史，就是旧中宣部黑线和旧市委黑线这两条黑线狗咬狗的历史。这个无耻的大叛徒把自己伪装成“红线”，而把起来造他反的三红革命教工干部都打成“黑线”，诬蔑他们是“旧市委黑线”“胡锡奎的党羽喽啰”等等。

想当初，赵桂林之流还是“八一八”、赤卫队的“人杰”的时候，把“两条黑线”论奉若神明，大叫大嚷的攻击人大三红“反郭是为了保护十七年黑线”，死保他们的“焦裕禄式的好书记”郭影秋。两年过去了，赵桂林之流撕下了“八一八”、赤卫队的袖章，带上了人大公社的蓝牌子，“新生”了。然而他们对于人大三红反郭的看法丝毫也没有改变。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是否还认为郭影秋是“红线”呢？如若不然，那么，人大三红与郭影秋及其御用工具“八一八”、赤卫队的斗争，岂不是成了黑线和黑线狗咬狗吗？

赵桂林之流还说过：“三红反肖前反对了，是派性的胜利；我们保肖前保错了，是派性的失败。”这是肖黄赵方之流在今年的二月逆流新反扑中贩卖超阶级的“唯派性论”时说的。那时候，他们矢口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不准讲“两条路线斗争”，把一切都说成资产阶级派性之争。那么，按照赵桂林之流的说法，从67年2月人大公社成立到9月王关戚死党、人大公社副社长肖前被揪出，人大三红与肖前及其人大公社的斗争，岂不是又成了黑线和黑线狗咬狗吗？

还有，人大三红反大叛徒李培芝与人大公社保李培芝的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斗

争？

人大三红反历史反革命凌静与人大公社保凌静的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人大三红反大特务、大汉奸黄达与人大公社保黄达的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人大三红反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赵德芳与人大公社保赵德芳的斗争，又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人大三红反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志西与人大公社保方志西的斗争，又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人大三红反现行反革命分子徐景秋与人大公社保徐景秋的斗争，又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人大三红反祁鹿鸣、杨桦、张尚武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与人大公社保这一小撮的斗争，又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人大三红反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薛政修、韩铭立之流翻案与人大公社为之翻案的斗争又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所有这些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难道都是黑线和黑线狗咬狗的斗争吗？在人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有两件特别重大的事情：第一，毛主席在66年“九·七”批示中批判了“调六百农民进城保郭影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对我人大三红的最大支持；第二，江青同志在67年“九、四”讲话中对我总部代表当面表示说：“你们打倒肖前是对的。”这是对我人大三红的最大鼓舞。现在赵桂林之流公然污蔑我们是“刘邓陶的反革命别动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请问：你们究竟要把自己置于什么地位？如果有勇气，就请你们回答吧！

赵桂林之流一口咬定：红卫队是“刘邓陶及其人大代理人的吹鼓手和打手”“社会基础”，“狂热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等等。

在人大十七年历史上，究竟谁是刘邓黑司令部及其人大代理人的“吹鼓手”“打手”和“社会基础”？究竟谁是黑线的“狂热推行者”？这个阶级阵线的划分问题，是原则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直接关系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什么路线。所以这个问题是弄清我校两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历史根源的关键，丝毫含糊不得。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用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法，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我校教工干部队伍在十七年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站队和表现，进行具体地调查研究。

我们认为，以我校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与郭孙胡李肖凌黄赵方徐为代表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矛盾是该校的主要矛盾。这个反革命集团是刘邓黑司令部在人大的代理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狂热推行者。他们是革命的对象，必须坚决打倒！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刘邓黑司令部社会基础的破坏者，是黑线的批判者，他们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否定他们，便是否定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绝大多数集中在人大三红特别红卫队中，而郭孙胡李肖凌黄方徐为代表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则是“八一八”、赤卫队和人大公社的决策人，追随这个集团的右翼势力是他们推行反动路线的重要打手，这个国民党反革命集团清楚地知道，以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为主体的红卫队对人大阶级斗争的历史状况最了解，是对他们的致命威胁，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死命地把打击矛头集中指向红卫队。这就是反动的“两条黑线”论和“胡崔势力”论的要害。

为什么郭影秋、李培芝、肖前、黄达、赵德芳、方志西之流都要把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与大叛徒胡锡奎连在一起呢？这是一种翻案风的反动思潮。一小撮走资派和翻案派认为：反革命两面派胡锡奎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所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胡锡奎的打手，所谓“胡线上的人物”“胡崔势力”“胡锡奎的徒子徒孙”，其源盖出于此。

正因为“两条黑线”论、“胡崔势力”论，都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革命理论，代表了郭孙胡李肖凌黄赵方徐为代表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们对这些反革命理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本能的爱好。谁宣扬这种反革命论，他们就集合到谁的黑旗下；哪个组织坚持这种反革命理论，他们就往哪里钻。两年来，他们开始集合在郭影秋的黑旗下，藏在以“两条黑线”论为“理论基础”的“八一八”、赤卫队的后面；郭影秋倒台后，他们又集合在肖前的黑旗下，钻进以“胡崔势力”论为“理论基础”的人大公社里面，或藏在它的幕后。这是人大前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年来，以人大三红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操纵“八·一八”、赤卫队、人大公社的郭孙胡李肖凌黄赵方徐为代表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以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同这个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目前我校教工干部的站队情况，基本上就是我校59年、60年两次政治运动，特别是61年以后翻案风时期的站队情况。人大三红集中了我校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人大公社则集中了我校反革命和右翼保守势力。人大公社肖黄赵方徐之流的立场、路线和思潮，就是他们当年大刮翻案风时的立场、路线和思潮的继续。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老翻案派。他们的派性，就是资产阶级翻案派的派性。他们的全部政治纲领，就是“翻案”两个字。不仅要翻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案；还要翻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的案，彻底复辟资本主义。而我人大三红的派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我们目前所进行的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是61年以后的反翻案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这就是我校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与前十七年阶级斗争的联系。

在人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要么站在人大三红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要么站在郭孙胡李肖凌黄赵方徐为代表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一边，沦为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二者必居其一。反三红，特别是反红卫队，是我校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根本方针。你也要反三红，反红卫队，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红公司，你就得接受他们那套反动的“两条黑线”论和“胡崔势力”论，你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死胡同里去。两年来从“八·一八”、赤卫队到人大公社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个道理吗？

现在，他们之中有些人正在审查自己的观点，开始重新考虑问题。这些人可能是有希望的。然而，他们之中的死硬分子赵桂林之流非但

没有悔改自新之意，反而像一条打断了腿的疯狗一样，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向我们反扑，把七八百名三红教工干部打成“一小撮坏人”并且捶胸顿足的嚎叫：“我们打击的红卫队这一小撮精华们，绝不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恰恰是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样做，“恰恰是打击了一小撮”，“恰恰是执行了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好，赵桂林之流，先别狂，我们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们：66年8月，正当

我人大三红大造郭影秋之反的时候，郭影秋就说：“现在咱们学校很不正常，原来的右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请问，按照你们所说的“历史”，岂不是你们的立场、观点和路线，同郭影秋完全一样了吗？

67年2月，郭影秋掀起了一段复辟逆流，攻击红卫队“多少年来在修正主义、在旧市委的管制下”，“也许这个认识是错的，就是我坚持反动立场；如果是对的，要对党负责，对文化大革命做出贡献。”请问，按照你们所设的“历史”，岂不是郭影秋也“对文化大革命做出贡献”了吗？如若不然，那就是你们同他一样坚持反动立场。

去年，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为了搞垮我人大三红，说什么“我可以红卫队不是革命组织”、请问，按照你们所说的“历史”岂不是戚本禹也执行了“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了吗？

反动老保赵桂林之流，如果你们有勇气，就来回答这些问题吧！

两年来，反动老保赵桂林之流从“两条黑线”论出发，栽了跟斗。后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在口头上也不得不避开“两条黑线”论，换上了“胡崔势力”论，结果又栽了跟斗。现在又重新回到了“两条黑线”论，仅次于老祖宗郭影秋，赤裸裸的把红卫队百分之一百以上打成“黑线”，所谓“胡锡奎的徒子徒孙”“反革命黑教师爷”的谬论，就是这么一回事。两年来，赵桂林之流思想演变的历史本身，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他们已经陷入了绝境。

《号召书》说：如果红卫队上了台，“就没有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了我们革命学生的地位，就没有了我们革命教员、干部的地位，就没有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地位。”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全面掌权的时候，人大公社中广大革命的工人、学生、教员和干部必将同我们一起来埋葬你们，而享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果实。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没有地位”的问题，想当初，戚本禹、肖前在位的时候，你们在喇叭里叫嚷什么：“人民大学这个政治舞台，我新人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占定了，永远占定了！”而现在，你们却预感到自己快要完蛋了，“没有地位”了。这正好说明，人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听吧一个最最伟大的声音传来了：“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

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宣告了反动老保人大公社总部反革命《号召书》的死刑！

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红人大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

举起你的双手去欢迎它吧，红人大是我们的！

[附件]:

反动老保人大公社总部的“五一六”反革命《号召书》（摘录）

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了。五·一六通知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我新人大战士满怀胜利进军的豪情和决战决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钢铁决心，来纪念她的发表。现在，人大地下黑党委（按：指亮相在三红一边的革命干部崔耀先等）已经深深地陷在革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横遭灭顶之灾。作为刘邓陶及其人大代理人的铁杆御林军，作为刘邓陶及其人大代理人的吹鼓手和帮凶，作为刘邓陶及其代理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由大叛徒胡锡奎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铁的狗崽子、中统大特务林培黎（按：林既不是特务，也不是红卫队员）一手组织起来的，以一小撮胡锡奎的徒子徒孙、反革命黑教师爷为精华的坏组织红卫队不能不有主子死、走狗悲的感觉。我校目前的这场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殊死搏斗，目前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的、更加激烈的、更加全面的决战，我们一定要将这场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否则，让红卫队中这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让红卫队中这一小撮胡锡奎的徒子徒孙、反革命黑教师爷，在他们的主子崔老妖（按：指崔耀先）的带领下上了台，就没有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按：指人大公社王关戚死党肖前、大特务黄达之流）的地位。他们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敌。对这一小撮十足的乌龟王八蛋，绝不能讲平等，讲博爱；对这一小撮十足的乌龟王八蛋，绝不能手软。对他们只能实行独裁，实行专政，实行镇压，必须彻底消灭。

原来，他们本来就是一批地地道道的、货真价实的、不折不扣的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胡锡奎的徒子徒孙、反革命的黑教师爷，是一小撮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乌龟王八蛋。由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及其核心骨干网罗一起拉起来的队伍。怎能不是一支刘邓陶

及其代理人的黑卫队呢？这样的坏组织黑卫队应该彻底砸烂！砸烂！砸烂！！！

我们打击的红卫队的一小撮精华们，绝不是属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恰恰是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是要推翻共产党、制造天下大乱、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右派。我们打击坏组织红卫队一小撮精华们，绝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如今，这一小撮乌龟王八蛋，代表着他们的黑主子，代表着他们的资产阶级，代表着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向我们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杀了过来，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我们革命工人，革命学生实行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是要镇压造他们之反、与他们不共戴天的革命工人，他们是要镇压造他们之反、与他们不共戴天的革命学生。

现在，反革命刽子手崔老妖的狼犬、坏组织黑卫队中的胡锡奎的徒子徒孙、反革命黑教师爷又举起了双方制止武斗协议的破旗，呼吁起约翰逊的和平来了。他们把狼的嘴脸换成了笑容可掬的猫的面孔，与革命工人、革命学生讲起什么阶级兄弟来了，必须识破他们这一反革命政治阴谋！这真是痴心妄想！资产阶级老爷们，收起你们那一套吧，新人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认得你们。如今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的这伙胡锡奎的徒子徒孙、反革命的黑教师爷们，从他们发出的悲鸣，竟要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讲起平等和博爱，让我们承认他们是革命者，让我们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让我们对他们实行温良恭俭让，这真是混蛋透顶，反动之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把他们消灭掉！向坏组织红卫队一小撮黑教师爷、胡锡奎的徒子徒孙更猛烈地冲杀！

【资料】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从人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以她为主体的新人大公社

（《新人大》第77期，1968年8月）

辛任达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能前进！

历史的见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并支持的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八、九月份，在首都出现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与此相应，人民大学也出现了三个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红卫兵组织。这就是一司人大红卫兵，二司八一八红卫兵，三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三个红卫兵组织的存在及其演变，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人大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

八月八日，由反革命两面派刘志坚的狗女刘平凡等黑帮子女发起的人大红卫兵，在反革命分子傅秋涛的家里撕毁一面五星国旗做袖章而秘密成立了。不久就成了一司重要成员，刘平凡还当了一司第一副总指挥。它就是现今反动臭老保“人大三红”的前身。

八月二十日，庞大的保守组织“八一八”红卫兵在一片“保郭”（影秋）声浪中成立了，不久，就成了红卫兵二司的发起者和重要成员。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在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新人大公社的前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正式成立了。她高举着“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从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立即加入了首都三司的战斗行列。

这三个组织，由于在对待两个司令部、对待旧人大、对待广大群众等原则问题上，各自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态度不同，因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殊死搏斗中，起了不同的作用，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原首都二司八一八红卫兵，由于它逆革命潮流而动，死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一开始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迅速崩溃了。

原首都一司人大红卫兵的广大战士在大造郭影秋之反的斗争中，做了一段革命的同路人，但是，由于其总部被陶铸的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左右，它的组织从上到下逐渐被刘邓陶在人大的代理人孙泐特务、叛徒、反革命集团及其第二套黑班子聂崔朱铁地下黑党委和坏组织红卫队所控制，死保旧人大，死保刘邓陶，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重蹈八一八红卫兵的覆辙，

陷入了反动臭老保的罪恶泥坑。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要革命的人大红卫兵和红卫队的广大战士，继人大红卫兵法律系中队“一·一四”暴动踢开总部之后，又一举推翻了人大红卫兵、红卫队总部，成立了《人大红卫兵造反委员会》《人大红卫队暴动委员会》，直到六七年三月初，才在地下黑党委的操纵下，把东方红公社、红卫队、红卫兵捏合在一起，并由戚本禹亲自命名为“人大三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正当八一八红卫兵彻底垮台，人大红卫兵日趋没落、一度垮台的时候，我三司人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却从小到大，越战越强，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